

SGRA REPORT

SGRAレポート No. 101 中文版

NO.101

ISSN 1346-0382

第69届SGRA论坛（关口全球研究会）

第七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历史大众化”与东亚历史学



第七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历史大众化”与东亚历史学

■ 举办背景

本“国史对话”项目的目的是促进各个国家的国史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自 2016 年发起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6 届。诸多参与者跨越国境齐聚一堂，围绕各国历史研究的现状与挑战、个案实证研究展开讨论，深化了交流。第 5 届（2021 年 1 月 9 日）与第 6 届（2021 年 9 月 11 日）在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仍秉持着应继续对话的方针，尝试以线上举办的方式，实现了深度讨论的持续进行。

本届论坛将“历史大众化”设定为新的主题，将以问题提出与三国研究者的指定评论为开端展开充分的讨论，以期进一步深化一直以来不断扩大的与会者的交流网。

为促进对话顺利进行，本届论坛也安排了中日、日韩、中韩语言的同声传译。

■ 举办主旨

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国史对话”尝试以线上方式举办研讨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鉴于目前改善活动的举办环境尚难以实现的现实，本次论坛继续以深化一直以来的与会者之间的对话为侧重进行了本次策划。

围绕各国历史学的现状，国史研究者们就各自所怀学术困扰进行交流，分享各自对各国现状的认知与理解，以期为今后的持续性对话打下基础，是本次论坛的一大目的。研究者们目前所面临的学术困扰体现在多个方面，本次论坛将会有所侧重。在各国社会形势持续变化、各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媒体急速发展的背景下，为应对新的需求而出现了历史相关叙述以多种形式持续增殖的现象，但国史专家们的声音却并未传达到关心历史问题的人们那里，并且现在的历史学无法完全应对这个问题，本次论坛试图将这个危机意识设定为具体的讨论议题。

虽处在相同的背景下，但因各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各不相同，具体状况自然多种多样，我们暂且将这种现状认识统称作“历史大众化”，在此基础上请各国研究者就本国现状进行报告，力图将本论坛打造成为各位研究者开诚布公地交流各自学术困扰，共同探讨解决方案的平台。

关于 SGRA

关口全球研究会 (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SGRA) 以推动实现良好的地球市民为目标于 2000 年成立, 因渥美国际交流财团所在地东京都文京区“关口”而得名。SGRA 以在日本各大学的研究生院从事研究活动的渥美奖学生的外国学者以及日本的研究者为中心, 为应对各种现代课题而进行研究及献策, 并通过论坛以及报告书等形式公诸于社会。SGRA 以开展领域广阔的、国际化的、跨学科的研究活动为愿景, 推动多国籍的研究人员广集智慧与人脉, 从多方面的数据入手, 展开分析和考察。

(www.aisf.or.jp/sgra/chinese)

第七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历史大众化”与东亚历史学



日期	2022年8月6日（周六）下午 1:00 至下午 4:00（北京时间）
方法	线上
主办方	第七届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组织委员会
协办方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

第1场	[总主持人：李 恩民（樱美林大学）]	
	前言	5
	李 恩民（樱美林大学）	
	论坛主旨	6
	彭 浩（大阪公立大学）	
【问题提出】	共同思考“历史大众化”	9
	韩 成敏（高丽大学）	
【指定讨论 1（中国）】	我所接触的公众史学	16
	郑 洁西（温州大学）	
【指定讨论 2（日本）】	日本正在发生的事：“历史学”专家的立场与边界	19
	村 和明（东京大学）	
【指定讨论 3（韩国）】	韩国“公共历史学”的现状与课题	22
	沈 哲基（延世大学）	
【评论】	对指定讨论的回应	24
	韩 成敏（高丽大学）	

第2场 [主持人：南基正（首尔大学）]

自由讨论

26

论点整理：刘杰（早稻田大学）

成员：问题提出者、讨论者、国史对话项目参与者

第3场 [总主持人：李恩民（樱美林大学）]

总结

39

三谷博（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闭幕致辞

42

赵珖（高丽大学名誉教授）

讲师简介 45

代后记

金旻泰 46

参加者名单 49

※同声传译

日语⇄中文：丁莉（北京大学）、宋刚（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韩语：李惠利（韩国外国语大学）、安暎姬（韩国外国语大学）

中文⇄韩语：金丹实（自由职业）、朴贤（京都大学）

第1场

前言

李恩民

樱美林大学



各位居住在韩国、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们、同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中·日·韩国史对话的可能性”第7次会议。以前参加过“对话”会议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再次回到这个大家庭。第一次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加盟，并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活动并给予支持。

这次会议的主办者是公益财团法人渥美国际交流财团，以下我简称渥美财团。渥美财团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中日韩为主的历史学者的对话平台，当然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学家的加盟。这个对话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的，到现在已经举办了6次，这次是第7次。这次我们所设定的题目是“‘历史大众化’与东亚历史学”，这次我们很有幸邀请了中日韩三个国家年轻有为的青年学者，他们都是各个大学的教授，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给我们做演讲，做点评，参加我们的讨论。他们都是在历史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今后我们在介绍每位发言者的时候就不再一一介绍各位的简历，如果有兴趣的话，会议资料上有相关介绍。为了我们平等对话，今后我不使用“教授”这个词，而是一律使用“先生”来介绍大家。

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我还想拜托各位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在网络进行会议，我们是有同声传译的，所以希望大家在发言的时候，说话速度要比您在教室上课的时候要慢一点，发言要清楚一点，如果您觉得有特别难的关键词，第一希望您能写在聊天记录上，用自己的母语写上去，我们有专业的文字翻译团队，一旦您写在聊天记录上的内容，我们很快就会翻译成三种语言，我们有同声传译和文字翻译两个团队。但您觉得在聊天记录上写有困难，您还可以写在纸上，通过屏幕展示给大家，这样有助于我们今后的交流。

今天的会议我们从日本和韩国时间下午两点，中国时间下午一点开始，将进行三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有三场报告，第一场由我来主持，我们主要是请中日韩三个国家的学者给我们做一个报告和点评。第二场由首尔大学的南基正先生主持，是请各位自由发言，自由讨论，有充分讨论的时间。到了第三场，我又会回来继续主持，请两位先生，赵珖先生和三谷先生，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会议，并做一个综合性的点评。整个是这样计划的，整个会议结束以后，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意见交流会，我们叫“懇親会”，大家在网络上可以自由聊天，这个可以自由出入，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整个的今天下午的会议安排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正式的会议程序。

论坛主旨

彭浩

大阪公立大学



谢谢李老师。能听到声音是吧。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刚才李老师介绍过的大阪公立大学经济系的教员彭浩。很荣幸这次能代表组委会来做一个开场的阐述会议主题的发言。我想大家已经了解我们这次会议是由关口全球研究会组织的中日韩国史对话的可能性这一主题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中的第七次会议，今天来参加会议的不仅有老朋友，还有几位是我们第一次邀请来的学者。所以请允许我借开场发言的机会，首先用两分钟时间简单回顾一下以前的国史对话活动。

关于国史对话，刚才李老师也讲了，是于2016年开始，旨在促进中日韩东亚三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国史领域的研究者的交流，以达成三个国家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共识。我们认为这种共识的达成，会推动长期困扰我们中日韩三国间的所谓历史问题的解决，在历史认知方面取得和解。

第一次会议在北九州市举行，我们邀请了来自韩国的赵珖老师，中国的葛兆光老师，日本的三谷博老师，三位作为各国国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针对国史对话的可能性阐述了各自的想法。根据葛兆光老师的提议，之后两次的研讨会我们选取了影响我们三国东亚地区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作为主题。第二次会议主题是“十三世纪的蒙古帝国的形成和东亚地区的扩张”，第三次会议的主题是“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政权的出兵朝鲜的问题”。之后我们顺理成章进入了近代，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十九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此次会议之后，大家知道新冠病毒开始大规模爆发，传染病流行作为一个应时而生的焦点，不容争议地成为了我们第五次会议的主题。因为无法面对面交流，从那一次开始我们尝试网络研讨会的形式，在今西女士、三宅女士以及各位同声传译老师还有其他相关人员的精心组织和准备下，网络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而在讨论传染病流行的问题时，我们也认识到人的移动、迁徙不仅与传染病流行密不可分，而且也是当今时事政治的热点社会问题。各位历史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多少都会触及到这个问题，这也是近年来史学界、人文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所以上次，也就是第六次研讨会我们以人的移动为主题，讨论了“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之间的关系。

以上六次会议的主题皆出于组委会的意见，在讨论下次会议主题时，我们希望曾参与过“国史对话”的学者也能积极参与到会议策划中来，为此我们尝试着征询了几位年轻学者的意见，征集而来的提案都非常有意思，都很值得讨论。各位组委会委员也各有偏好，讨论了很长时间，经过三次讨论之后，作为选题最后脱颖而出

的就是今天大家已经看到的会议主题，“‘历史大众化’与东亚历史学”。这一提案出自接下来要做主题发言的韩成敏老师，韩老师提出的正是当今社会中出现的一种困扰我们历史研究者与普通受众进行对话的问题，可以说我们每个历史研究者都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并积极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很多学者埋头各自专业的研究，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很惭愧，我本人也是其中之一吧，需要检讨。

我们“国史对话”项目从初次对话就确定了一个基调，也就是我们的对话不仅在于像其他研究会一样推动学术交流，也特别意识到如何将学者间达成的共识反馈给社会。我们发现学者层面的讨论很容易达成一种共识，但如何使社会上非专业人士也能同样接受，却有相当的难度。但是之前我们的问题意识还主要停留在历史书籍的撰写，特别是历史教材的编写这一层面，但是韩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可谓大大超出了这一层面。他提到了很多当代社会中一些非专业人士不太负责任地在大肆宣讲历史这一问题，可能有很多方面之后各位发言的老师还会再详细分析，其中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近十年来新媒体的发展，网络时代的到来，都与这个问题息息相关，网络的公共空间为许多没有接受过历史学术训练的人轻易谈论历史，发表相关言论提供了平台，加之我们社会中出现了各种非主流新文化、亚文化的问题，迎合大众心理的评论就会有很大的市场，在很多领域淹没了历史学家的言论，误导了民众，这当然毋庸置疑已经成为威胁历史学如何服务于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我们历史研究者当然不容坐视不问，袖手旁观。

但是，谈论这样的话题也有相当的难度。这次的对话，也就是说要在历史学中非要划分一个领域的话，我认为是属于史学史，或者史学理论方面的问题。根据我的印象，我们目前为止的“国史对话”参与者当中，多是主要以某一个时代、某一个领域做具体实证研究的学者，当然都是历史专业出身，应该说都有一定史学理论的知识素养，但多数人可能像我一样，长年专注于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对于史学理论的发展动向，特别是针对当前的社会问题及历史教育问题的一些最新动态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于很多基础概念各自的认知也未必相同，比如说，我们这个主题的关键词之一的“历史大众化”，是应该被作为一个现象来看，还是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来看，可能在接下来会有不同的意见。再比如说，“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或者说“公共历史”，这些术语是否可以等同而论，可能还不清晰。由于缺乏明确的有共识性的定义，在讨论过程中也比较容易造成误解和混乱，所以我想借开场阐明会议主题的机会敦请各位发言人和讨论者注意各自的在接下来发言时的概念表述，以及与其他发言人的表述是否有差别。但反而言之，正是因为这是一个缺乏前提性共识的问题，所以才更值得我们去积极讨论，以便取得共识，建立新的知识共享的平台，推动之后的更为深入的交流。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国史对话的宗旨和意义所在。

好的，我的开场阐明会议主题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

“国史对话”项目历程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于2015年7月举办了第49届SGRA(关口全球研究会)论坛，讨论了“东亚公共财产”和“东亚的市民社会”的可能性。通过讨

论确认了，首先我们要在东亚建立“知识共享空间”或“知识平台”，之后向东亚提供和解型策略的意义。

2016年9月以第3届亚洲未来会议为契机我们举办了首届“国史对话”，“国史对话”平台就是这样诞生的。迄今为止三个国家的研究者之间虽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对话，但能左右各国历史认识的“国史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还不够充分，从这一意识出发，我们首先探寻了可能让东亚历史形成对话的条件。具体是通过三谷博老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葛兆光老师（复旦大学教授）、赵珖老师（高丽大学名誉教授）的报告演讲，探讨中日韩三国各自的“国史”如何处理亚洲的问题。

为从结构上理解本国史与国际关系，第2届国史对话设定了“蒙古来袭和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全球化”的主题。2017年8月在北九州，来自日本、中国、韩国、蒙古的11名国史研究者聚集在一起，从各国国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报告后，从东亚历史的角度，对朝贡册封、蒙古史与中国史、资料的处理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此次会议的多个报告都表明，只要关注东亚整体的动向，不仅能看出国际关系，还会找到能更深入理解单个国家和社会的线索。

第3届国史对话进一步将考察时间往后推，设定了“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议题。2018年8月，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9名国史研究者聚集在首尔，讨论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和满洲的皇太极各两次入侵朝鲜，以及其背后以银贸易为主轴的紧密的经济关系，和战乱后的安定问题。另外，为回顾这3届国史对话，还进行了由早稻田大学主办的“面向和解的历史学家共同研究交流网的考察”的小组讨论。

第4届对话的主题是“‘东亚’的诞生：19世纪国际秩序的转换”。2020年1月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国史研究者聚集在菲律宾马尼拉市，围绕各国的“西方认识”，“挑战传统和创造传统”，“跨国界人的移动”问题进行了报告和广泛的讨论。

第5届对话以“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应对”为主题，由于新冠疫情2021年1月于线上举办。会议思考了各国在19世纪如何认识传染病问题，提出了怎样的应对对策，并探讨了各国的相互协作情况及其局限性。除了来自各国的论文报告外，还有非常多的前4届会议的与会者以小组成员的身份参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虽然因为新冠肺炎不得已在线上举办，但是我们因此而建立了Zoom网络研讨会这个平台，促成了一次有意义的对话。

第6届对话以亚洲近代的“人的移动与边界·权力·民族”为主题，与第5届相同继续以线上方式（三国语言同声传译）举办。盐出浩之老师（京都大学教授）在问题提出环节中以近代左右人移动的国境为焦点，指出人的移动与国家主权体制和国际政治结构（帝国主义和冷战）密切相关。在之后的环节中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次论坛稍具实验性地以自由讨论为主设置了1日的会议流程，实现了充分活跃的讨论，备受好评。

本项目除了推动在论坛、讨论环节中的对话以外，还为建立圆桌会议与会人员的交流网，开始配发使用三国语言编撰的报告书，并以邮件杂志形式推送与会者的文章等。历经5年的积累，已经成长为超过270人的中日韩各国国史研究者参与的交流网。



共同思考“历史大众化”

韩成敏

高丽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龙日（东京大学）]

大家好，我是刚刚承蒙介绍的韩成敏。好像每次参加本学术会议的时候，我的工作地点都会发生改变。刚才介绍时说我在世宗大学，但今年6月1日我已经调到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院了，所以现在的所属是高丽大学。

这次我提出的会议主题是“共同思考历史大众化”。我这次报告的内容，主要是我对韩国事例所作的一些思考，其中大部分内容也都和我的同事们一起讨论过。当然，对于本次报告的相关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在提出这个主题时，我的主旨是“我们至少要正式地讨论一次目前历史学或历史学家们的形态以及存在的问题”，也许在日本或中国的老师们也曾就该主题与身边志同道合的同事进行过讨论。但这些主题并未能成为公开场合下正式讨论的对象，对于以历史为主题的媒体内容产品中的错误部分，即使存在问题，除了私下讨论以外，历史学似乎并未在公开的讨论平台对其进行探讨。将这些问题带进讨论，一起探讨其他国家的情况和在座各位老师的苦恼，然后再思考一下能有什么对策是我主要的问题意识。

在提出这些问题时，当然会有人问：“那你认为有什么对策？”作为其中的一个例子和替代方案，我关注的是“Public History”。虽然韩国翻译的意思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一般都是将其翻译成“公共历史”。对于公共历史，我之所以没有给出精确的定义与说明，是担心讨论会往那边发展，所以有意省略。不过作为对策之一，我认为可以考虑公共历史。我看了一下上传的讨论内容，发现大家对公共历史都很感兴趣。希望今天的讨论能把这些内容都包含在内。接下来我尽可能简洁地完成我的报告。

1. 问题意识

首先，我把目前的问题意识概括为三个方面（幻灯片1）。分别是：“历史学的危机”、“作为历史学家的危机”、“现实性问题”。首先是历史学的危机，随着时代的变化新媒体登场，而得到新媒体支持的“伪史学”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幻灯片 1

兴盛。与此同时，它们还得到了未能掌握正确内容的大众的支持。大众支持的背后是人们对于“历史消费”的多样需求，但由于正式的历史学未能回应这些需求，导致“伪史学”占据了这一空缺。

其次，所谓历史学家的危机，比起具体的历史问题，其主要关涉的是历史学家之前所拥有的垄断地位的终结。对于这个危机存在两个问题，即“历史学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以及“历史学家们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多种多样的媒体开始出现，时代也在不断变化，但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们跟以前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

像这样跟不上时代，就会在现实中引发问题。其中最严重的便是“史学系能否存续”、“是否有后继者将学问传承下去”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史学系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对此，部分大学和学科虽然暂时采取了应对措施，但我认为这些只不过是短期的临时性对策。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根本上思考当前的历史学、历史学家的危机。

2. 历史学的危机

具体来说，我将历史学的危机分成了三个问题（幻灯片 2）。首先，时代变了。就冷战结束后的韩国社会而言，此前历史学在提示社会发展方向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随着社会民主化的发展，历史学的这一社会作用大幅缩小。这不仅仅是历史学的问题，也是整个人文学的问题。我认为，随着整个人文学失去方向性以及社会关注度的下降，全社会对实用性的学问，即“能赚钱的学问”的关注度在上升，而在多轮经济危机的加持下这一状况还在进一步加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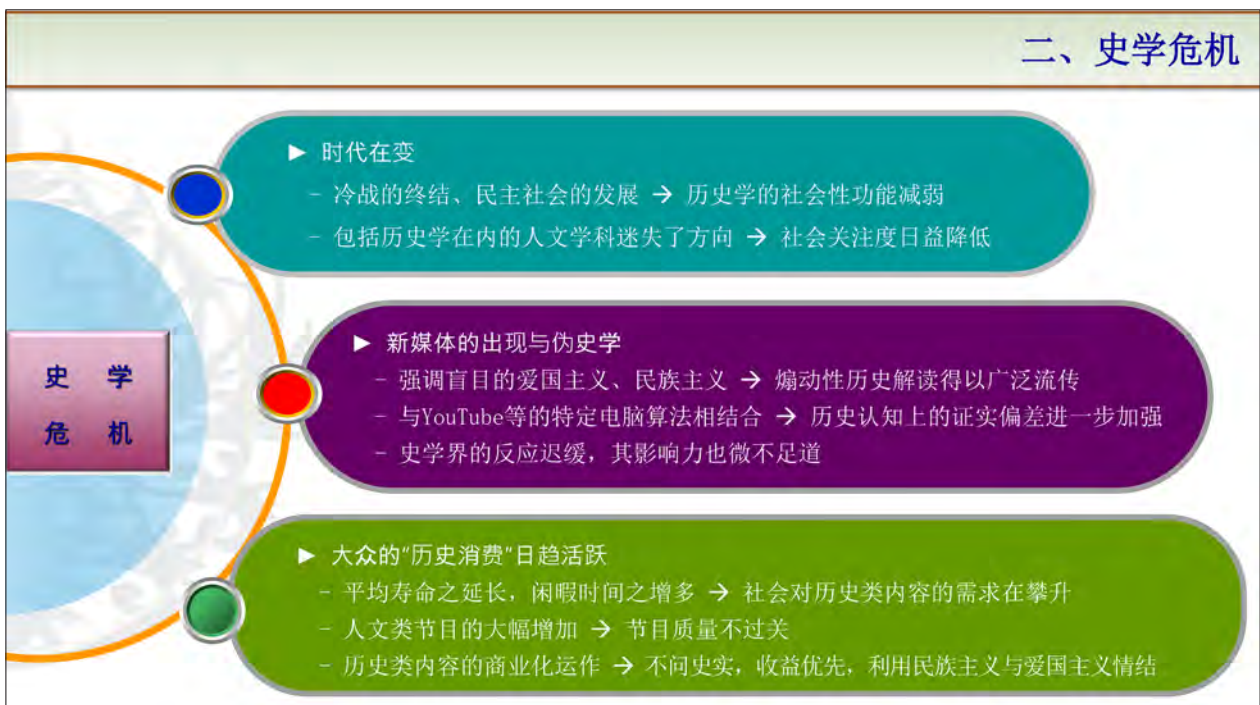
其次是新媒体的出现和“伪史学”。新媒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YouTube”，从 YouTube 上播出的历史内容来看，相当一部分是在强调盲目的爱国主义和民

族主义。我认为，散布煽动性历史解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或在于此，当然传统媒体在其中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为了中日韩历史的和解，我们每年都会举行学术会议，我是从2020年1月开始参加的。然而，与中日韩之间对历史的解释不同，通过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传统媒体或新媒体传播的内容反而煽动了各国之间的对立，朝着他们所追求的利益的方向发展。在我看来，历史学和人文学并没有很好地将其控制住。

尤其是像 YouTube 这样的新媒体，结合特定算法，不断扩散存在确证偏向的历史认识。它借由大众的关注点进行再生产，强化对特定历史解释的确证偏向性的历史认识。但是对于这些情况，历史学界的应对异常迟缓，即使有所应对也几乎很微弱，不知道是不是对与大众直接沟通有所顾忌的缘故。学者们的研究能力是以论文篇数和著作等研究业绩来评价的，但与大众相关的问题并没有评价标准，因此大多数历史学家要么仅仅是表达遗憾，要么是几个人共享“这样下去能行吗”的担忧，仅此程度而已。

最后是历史消费在大众领域的蓬勃发展。全社会的经济能力得到提高，平均寿命也延长了。从职场退休后便有了相当多的闲暇时间。因此，社会对历史内容的需求也正大幅增加。其结果是，各种人文学相关的节目以及专题节目在媒体中不断增加。除了媒体，各种机构的项目数量也在不断攀升。

但是，这些新增的历史节目的质量却很不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短期内培养出来的博物馆讲解员和历史遗迹的导览员承担了历史讲解的工作，而在网络媒体中则主要是由新媒体承担了这个工作。他们通过以盲目的爱国主义或民族意识来填补历史内容中的缺失这一手法，来提高听众的满足度。传统媒体和企业正在进行将历史内容商业化的尝试。因为有实际需求，所以想把历史内容和利益联系起来。他们对这些是否是真的历史事实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只是大众会不会对此作出反应而



幻灯片 2

已。我认为，从收益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刺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绪就是目前企业和媒体的收益结构。

3. 历史学家的危机

那么历史学家们又如何呢（幻灯片 3）？可以说，历史学家垄断历史阐述的时代已基本终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垄断了对历史知识、解释和接触史料的机会。其主要武器是专业性。以韩国为例，过去的史料主要是汉文资料，但实际能看懂汉文的普通大众并不多。他们以这种专业性为武器，发挥了向大众传达具体内容和解释的作用，但我认为现在这种作用正在不断消退。

现在的韩国翻译了很多史料。通过各种国家事业、国家机构、相关研究机构和大学项目，大量史料已被翻译出来，翻译的内容被数字化后，作为数据库化直接通过互联网提供给大众。普通大众对自己感兴趣领域的史料，可以立即查阅并掌握其内容。这样的结果是历史学家的学术垄断被打破，大众现在可以自己解释历史，不用依赖历史学家。

但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并没有做出多少改变。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和 100 年前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没什么不同。因为分析史料，撰写论文和著作，以及讲课的这种形态与 100 年前并无太大区别。撰写论文和著作之所以能成为学者们的主要活动，是因为当这些东西首次出现时，能够传达给大众最有效的媒介是文字和文字印刷。但是现在向大众传递信息，其他媒介正在发挥更大的效果。历史学家究竟有多少人对此做出了回应呢？用手写稿件的时代已成过去式，大部分人都会用电脑写论文或书，包括我现在做的 PPT 也是用电脑做的。

三、史学家危机

▣ 史学家垄断史学的时代已经终结

- ◆ 从前的史学家：垄断了对历史知识、历史解读以及接触史料的权利
- ◆ 史料的翻译、数字化、数据库化 → 大众可以在线浏览史料
→ 大众无需依靠史学家，可以独自接触史料并对其进行解读
- ◆ 史学家的学术垄断正在消失

▣ 固步自封的史学与史学家

- 当今史学家与一百多年前的状态相差无几
- 分析史料、撰写论著、课堂教学
→ 除此之外，很难见到试图走进大众与社会的新思考、新方法
- 史学界研究成果与大众认知之间的差距在拉大

幻灯片 3

历史学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熟练使用这些新媒体呢？如果说过去看不懂文字就是文盲，那么现在如果不能很好地使用电脑，就应该是电脑盲了。我认为，大部分历史学家对电脑的使用形式都停留在对 Word 程序或者数据库的使用，基础的 Excel 操作，以及在互联网上查找信息的程度。如果你问我有多少历史学家有能力自如地活用这些媒介，我会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不会用 Word 程序处理比较难的东西，更不用说这么复杂的东西了。

虽然，我们需要思考接近大众和社会的新方法，但我感到“努力是否还很不够”或是“思考是否还不充分”。由此，历史学及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与大众之间的鸿沟愈发加深。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在 2000 年代中期以前，如果在韩国举行学术大会，也会有大量的普通大众参与。但现在逐渐成为只有历史专业人士和历史学家参加的学术大会，可以说历史学家是孤立的。当前，大部分历史学术会议都是由符合相关主题的学者们参加，即使同是历史学家，如果研究的时代和主题不同也不会关注。虽然他们都被称为专家，但都是既专又窄的领域内的专家。而大众对历史的关注点多种多样，所以我认为这种过于细分、只集中在某一个领域的研究形式，成为了难以迅速回应大众对历史做出的反应或提出的问题的因素之一。

4. 现实性的问题

此外，整体人口的减少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韩国社会现在的总和生育率不到 1（大约是 0.8），人口正在急剧减少（幻灯片 4）。我上大学的时候，韩国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超过 100 万人，但到 2022 年就已经不足 25 万人了，减少至 1/4。与此相反的是，大学的数量却在增多。在人口减少、历史学的社会作用减退的状况下，

四、现实问题

▶ 整体人口的减少，史学的社会性功能减弱
→ 出现了历史系存废与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

历史系的存废、毕业生就业问题	历史相关学科的短期对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大学课程中得到历史科目的减少 ▪ 历史系的招生难 ▪ 院系改革时的合并首选对象 ▪ 毕业生的就业难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部分历史系尝试变更学科名称 ▶ 课程设计上没有根本性改变 ▶ 仅为缓兵之计，治标不治本

历史学科及学术传承断代之忧

幻灯片 4

出现了史学系存续、毕业生就业等现实问题。大学的历史课程本身也在缩减，课越来越少，各系也越来越难以保持其生员量。

在韩国有这样的说法，大学可能会按照春天开花的顺序倒闭，因为韩国的首都首尔在北方，因此会从最远的南方开始，这种学校倒闭的危机感正在不断增加。届时，最先取消的学科可能就是史学和哲学等人文学的基础学科，成为学科合并优先对象的也将会是史学系。

这也导致毕业生就业越来越难。对于毕业生面临的困难，韩国最近经常用到的词是“文悚”，意思是自嘲说“因为是文科，所以抱歉啊”。在就业市场上，文科毕业生普遍不受欢迎，史学专业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对学生负责的角度来思考应对方法和对策。

韩国部分大学史学系曾试图通过变更学科名称来应对这个问题。认为存在变更名称的社会需求的学科率先将名称改为“历史文化学科”或“历史内容学科”等，但是所学的课程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只是增加了一两门相关科目，实际内容与现有的史学系几乎相同。由于未能形成历史与内容、历史与文化相融的综合性跨学科的结构，我认为这只是暂时延缓了危机的到来，并不能成为根本对策。因此，对当下史学系和史学后继传承的问题我们要有危机意识。当然，我分享的这些是韩国的情况。

5. 关于对策

在韩国历史上，1980 年代曾出现过“历史大众化”一词，当时韩国社会内部的社会变革运动、民主化运动和学生运动都很激烈。历史大众化在“向大众普及对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认识”层面上意义重大（幻灯片 5）。但在那时能理所当然地使

五、路在何方…？

◆ “历史大众化”之术语问题

- ❖ 韩国国内话语下的“历史大众化”这一术语的使用 → 对其批评较多
- ❖ “历史大众化”的内涵 → 史学“向通俗历史、趣味历史之转变”的意义
- ❖ 类似于一种大众启蒙的概念
→ 暗含前提为“大众的无知”，默认了史学家对历史认识和历史叙述的垄断性权威。

◆ “Public History”：作为一种对策

- ❖ 发表者提议的“历史大众化”事实上更加接近于“Public History”。
→ 韩国译为“公共历史”，日本音译成“パブリック・ヒストリー”，中国称之为“公众史学”
- ❖ “Public History”的概念及主要内涵因国而异 → 有待展开
- ❖ 史学亟待证明自身的存在意义 → 史学应何去何从？

幻灯片 5

用的这个用语，在 1990 年代后受到了很多批评。历史大众化的含义是“大众易读的历史”乃至“转换为大众感兴趣的历史”、“轻松有趣地讲内容”，于是有人批评说这是“无视大众的类似于大众启蒙的概念”。轻松有趣地讲大众历史，其前提是认为“大众无知”，以历史学家对历史认识和历史叙述的垄断权威为前提的部分成了批评的依据。

虽然，这种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写得容易懂、写得有趣也是没有问题的。就专业用语来说，一直使用难懂词汇的论文或著作事实上也无法被大众接受。作为历史大众化的另一种对策，作为解决历史学问题的替代方案，我的建议是使用“Public History”。但是，80 年代在韩国发生的历史大众化问题实际上很接近 Public History 中的一部分。所以 Public History 在韩国被翻译成“公共历史”，在日本被翻译成“パブリック・ヒストリー”（片假名外来语），在中国被翻译成“公众历史”。但每个国家的公共历史概念和主要内容都不一样，所以我省略了主要内容部分，因为我想把讨论的焦点放在历史学危机和历史学家的危机上。

我认为现在是历史学自证其存在意义的时候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对于反历史主义以及歪曲历史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即煽动性的历史解释，我们该作何解释呢？不知在座的日本和中国的老师们有何感想，我想敞开心扉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有哪些对策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

我所接触的公众史学

郑洁西

温州大学



渥美国际财团联系我，希望我能谈谈我的老东家（原来所在单位）宁波大学在公众史学这方面的情况。

我主要解读明代行政公文，主要基于文献材料开展历史研究，对公众史学算是外行，其实并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既然有这方面的要求，我就勉为其难地谈一点自己的粗浅见解。

宁波大学的公众史学是由钱茂伟教授开创的。钱教授出身于中国史学史专业，原本专攻明代史学史，主要从事古籍整理、科举史、史学著作等相关领域的研究。钱教授在后来的教研工作中对公众史学产生了兴趣，做了大量相关理论、实践研究，在业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国内公众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的研究者并不局限于历史学者，大量研究生、本科生也被发动参与进来，“口述历史”则是学生们做得最多的一个领域。让所有人都成为历史主角，让本科生也成为“太史公”是该校公众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据我个人所知，“公众史学”有两个做得比较好的案例。一个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个是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半外交家中的“半个”外交家顾维钧的《顾维钧回忆录》。前者是溥仪在东北抚顺战乱管理所服役期间本人口述而成的一份自传体悔罪材料，后由出版社派人协助完成并正式出版。顾维钧的回忆录则为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计划”的高水平之作，除了顾维钧本人的口述，还采用了大量日记、会谈记录、信函文件、电报档案编纂而成，历时长达 17 年之久。两位主角都不是历史学者，一位是“末代皇帝”，一位是外交家，是众多国内国际重大政治外交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人，通过“口述历史”这一路径，还原了其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历史、人物、事件，披露了不少鲜为外人所知的背景和内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一手资料，在学界影响力很大。但这两种“公众史学”并不局限于“口述”，有着大量其他文献资料的佐证，有着较高的严谨性。

我没有参加宁波大学的“公众史学”研究项目，但自己也确实参与过一些公众史学活动。每个人接触历史时，多多少少会对自己家族的历史有兴趣。我就曾花了一些时间去挖掘、整理自己家族的历史。我们家原本耕读传家，比较重视文字记录，

但在近代以来,因为战争以及1949年以后的某些政治运动,文化几乎断层(被抄家,被剥夺受教育权),已有文献的散佚情况也比较严重,目前仅见我的曾祖父的祖父、伯父各留有一个诗集和文集,我的曾祖父的一个诗文集,都是因为偶然的因素才得以留存,而除此之外,文献方面仅有家谱里的世系或简传可供参考。但因为我的曾祖父活到90多岁,村中镇上年长者中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事迹,我便通过采访这些人,邀请“公众”参与“史学”得以抢救了他的一些历史经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和我的家族算是“公众史学”的受益者。但因为记忆存在时限问题,再往上追溯则很难具备可能性。

我接触“公众史学”过程中也看到几个问题:第一,可信度问题。众所周知,史学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求真务实”,传统史学对史家的素养有较高要求,但“公众史学”的参与者,既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者,也可以是未曾有过任何历史学素养的外行人士,这些参与者鱼龙混杂,良莠难分,他们所叙述“历史”的可信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素养,有些受访者只想告诉别人他想告诉、能告诉人的一面,但会刻意规避另外一些信息。此外,很多口述者作为历史主角不一定具备学术良知或道德良知,其对自己的叙述往往极尽虚夸之能,其所叙述的历史有时候会偏离正常轨道,很多涉及到利害关系的历史信息则往往会被巧妙地移植、嫁接甚至被黑白颠倒,文革时期的“英雄战士”刘学保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公众史学”大行其道的当下,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仍然需要兼顾,历史学者应该尽可能地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原则。第二,伦理问题。我最近在做一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浙江某山区小镇的二百余名赴日务工者群体的研究,这些人已经都不在世,目前最全的资料仅仅是1984年的一个全县华侨排查采访记录,我根据这份记录采访了很多当地人,发现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这批赴日务工者在上世纪30年代还带来多名日本女性回到山区。当地人认为她们是被“拐骗”过来的,有如近期徐州出现的拐卖妇女事件。通过跟踪调查,后来联系上了其中一位日本女性的孙女。这名孙女现居日本,告知我其祖母来中国时20来岁,在浙江山区生活了40年,嫁过两个山民,大概在197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方才回日本,并把儿孙辈都接到日本去,在日本又生活了近30年,一直到十几年前近百岁时才过世。据该孙女回忆,其祖母头脑清晰,素养甚高,但对往事却绝口不提,其家人对她的早年经历几乎一无所知,1984年的采访记录也没有关于她的任何信息。在这个个案中,能够参与的“公众”并不少,但所能得到的信息却相对匮乏。其根本原因在于,这名女性参与“公众史学”的意愿过低。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排查中日两国档案以及进一步采访相关涉事人尽可能地还原出这名日本女性的过往历史,但挖掘和公布这段历史可能会某种程度上对其本人及其家族造成伤害,关于这个个案,在事先需要就伦理问题有所斟酌。第三,研究价值问题。我在采访中遇到过某些群体,其学历较低,语言逻辑也差,生平事迹并不具备代表性,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能采访到的内容主要是其日常。这种记录非常真实,但意义不大,采访得再多,资料堆砌得再多,也缺乏历史价值。“公众史学”虽然扩大了历史研究对象群体,对“太史公”群体也降低了要求,但我们仍然需要在历史研究的价值方面有一个基本的追求,尽可能地创造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高质量历史研究成果,尽量避免制造大量重复的、低层次的历史叙述垃圾。

最后讲一点现实问题。历史学作为传统学科,在中国被取消掉的概率不是很高,但因为这个专业相对冷门,目前的饱和度较高,就业前景并不理想。即使博士毕业

生也很难找到理想工作。有些大学或压缩历史学专业的招生名额，或在课程设置上缩短历史学基础理论的学习而造成历史学毕业生历史知识贫乏的怪现象。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呈下降趋势，我所指导的一名研究生今年上半年已经毕业，她所在班级共 22 名同学中有一半迄今工作尚无着落。他们意向中的就业方向，除了进初高中做历史老师，就是考公务员或其他事业单位。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单位在体制之内，是政府财政支持的，经济上有保障，而疫情背景下的其他工作则很难具备这种保障。整个社会的年轻人首选进体制，历史专业的本硕博学生概不能免，这或许反映了当下中国的某个社会问题。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日本正在发生的事： “历史学”专家的立场与边界

村和明

东京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宁（东京大学）]

我是东京大学的村和明。今天的主题涉及到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想谈的也特别多，在之前发给大家的资料中我已经概述了相当多的内容。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欢迎大家提问。如果在场有谁对日本的情况比较了解的话，也希望在后半部分的讨论环节帮忙补充。

关于今天讨论的主题，我自己并没有特别研究过，也没有对相关课题付诸过什么行动。因此，今天我要谈的只是我看到的一些情况。

首先，关于韩成敏老师谈到的韩国现在正在发生的现象以及问题点，我认为这些与日本是非常相似的，甚至可以说大部分都相同。而且我对韩老师提出的很多问题意识和应该思考的课题也有同样的想法。

接下来我主要想谈两点。第一点是“日本当下正在发生的事”，这些事可能会跟韩国有些许不同，基本不会谈在日本和韩国发生的类似情况。第二点是在之后的讨论环节想与大家讨论并听取大家意见的问题。关于第二点我将大致从四个层面来探讨。

首先，关于“日本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有很多研究者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在平时的交流中也会经常谈到这个话题，但研究者以群体的形式进行的讨论与行动却非常有限。在发给大家的资料中，谈到我了解到的身边正在进行的活动时，我列举了“在地区史料调查与研究中的共同协作已有数十年的尝试”的事例，详细说明请允许我在此省略。我在资料中写的是有很多研究者关注这个问题，不过今天的参加者中日本人的名字并不多，所以我现在对此有点不确信了。

在“历史学”和“历史学专家团体”之外，再加上国家与社会所要求的“历史”（包含亚文化在内）来进行思考的话，在日本的“历史学”主要就是由大学的专家团体推进，同时有高中老师以及研究乡土历史的非专业者的参与。但现在后者的人数锐减，在大学工作的专业研究者处于非常孤立的状态。

听了韩老师的报告后，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日本与韩国是不一样的。在思考宏大的历史问题时，我感觉在日本基本上没有过被历史学或历史学专家团体垄断的时期。

对于人们钟爱的宏大历史的论述，会出现意见领袖（influencer），其中以其他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包括自己认证的专家在内）和记者居多。身为历史学专家的

意见领袖几乎没有。不仅人数少，他们还会受到来自其他研究者的严厉审视。通常会被认为是在迎合大众。相反，在近 200 年间，拥有强大影响力的群体是作家，比如赖山阳、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等写历史故事的作家。我认为他们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只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慢慢减弱。

那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内容吧。人气高的历史内容有哪些特征呢？可以举出很多，但其中一定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内容，概括起来可以说就是简单粗暴的“政治善恶二元论”，即仅以善恶对立判断事物，如日本是善，俄罗斯是恶，此政党为善，彼政党为恶等。

其他受欢迎的还有很多，宏大的比如有宣扬英雄主义的故事和伟人传（讲述成功秘诀）等，琐碎的则有令人感伤的引发共情的小故事（结尾有转折的短篇），这些都成了平民老百姓的娱乐。用平民老百姓这个词显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似的，其实我想表达的是这些很多都是劳动人民的娱乐。它们以戏剧、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呈现出来，与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一脉相承。

但是近年来，有一些开始伪装成“伪科学”（对韩老师讲到的“伪历史”，我很感同身受），我甚至认为其势头已经达到了连真正的专家都难以区分的地步。

如果要去那些发展势头强劲的内容和其相关媒体，就会发现网上的短内容比较多。YouTube 在日本也非常有影响力，主要是 YouTube 上那些非常短的内容。我觉得跟韩国比较类似的是，这些内容中有特别多是面向退了休的老爷爷和老奶奶的。其次，日本有很多人因为超时劳动和低工资而身心俱疲，充满了不安与不满的情绪，这可能是跟韩国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认为这也是产生对这些内容的需求的一个原因。

接下来我想谈谈专家团体。在日本，历史学主要设置在文学系，以前在其他很多系里也有可以学习历史的课程，但现在越来越少，因此想要在文学系以外的系学习历史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跟韩国类似，文学系修改名称，以及学生人数减少的状况也在持续。

信息数字化也在不断发展。但我认为在日本，与历史相关的资料和研究书的公开确实比较慢。不过在日本的书籍出版层面，这一不足稍稍得以弥补。专家写的页数较少、简单易读的新书可以卖出上万本，这类出版活动很活跃，相关书籍也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非常现实性的希望。

下面，我把想要跟大家讨论并听取大家意见的问题归纳成四个要点。

第一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并不仅仅是历史学的问题。我想同时思考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应该从更大的框架进行思考，第二个层面是在这个框架中历史学需要思考哪些问题。

首先，在思考如何“超越历史学”时，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体系从整体上正在发生着剧变，在世界范围内学问和专家的权威性正在被动摇。不以研究为目的的“伪科学”的传播非常广。以日本为例，以国家权威为背书的大学的权威，以及以大学或大型出版社为背书的“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几乎已成为废词）的权威，现如今基本都处在崩溃状态，甚至遭到敌视，现在在互联网上存在敌视大学专家和知识分子的（反精英主义）倾向。

如果限定在历史学中思考的话，所谓历史（包含大历史），它诉诸感情，对世界进行解释，对相关话题每个人都可以有所论述，从而使非学术性话语得以广泛存

在。这是历史的特征，但我认为所谈论的内容是否具有学术性，除了专家，大多数人其实都无法判断。

比起内容更重形式，即以讲者的头衔或其讲述时的情境为依据进行判断。同时也会因其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而易于受到影响。它会成为消费的对象，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也非常有效。

第二点，我认为需要尽可能用历史学的方法思考这些问题。今天的会议为各位历史学研究者提供了齐聚一堂共诉苦恼的平台，但我认为我们也有必要用历史学的方法进行思考，在思考这些问题时不要抛开历史学的专业单独去谈大众化。我希望大家能以深化历史学自身的发展为目标来探讨今天的问题。

我想简单举一下理论和研究对象的事例。“历史学”通常是在纸质印刷的论文、书籍等研究成果中，或是在人数较少的小型口头报告一类的封闭空间中进行相关议题讨论的，很少会有将研究内容面向社会进行广泛的启蒙和普及的情况。这在日本历史学的传统中一直都有，我认为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并思考其利弊。除了不利的地方，我认为当然也需要思考它有利的地方，在此之上进一步探索今后的发展方向。

关于研究对象，可以思考的问题有：“个人收集信息认知世界的结构”、“有关特定话语因有某种权威性而具有影响力的构造”，以及“专家团体、专业知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社会的分裂与整合的状况”等。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这些研究，以新的视角将其推进下去。

第三点，今天在场的各位都可以说是专家团体中的一员，我们在认同历史学必须改变并思考如何改变其发展方向的同时，我认为也需要思考历史学中不可改变的面向。思考如何在确保生存下去的同时保持学术研究的尊严，并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于要重视的事情，我做如下阐述：“对于基本事实的解释和积累这类不起眼的工作也要追求极致，讨论要基于事实根据，谨慎考证信息的可信性，不要急于给出结论或评价，要妥善保存那些能成为根据的信息。”我认为需要重视这些工作的价值。而当今社会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我认为我们切不可去迎合这类社会变化。

今后应该还是会有人坚持这种价值观的，而这里正是汇聚这些人的一个平台，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一起思考如何让这个共同体得以存续下去。

最后一点，我们在探索改变的方法时，我认为必不可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预见我们身处的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下面我仅谈谈我的个人感受，我认为当今社会的信息量已呈爆发式增长，以致我们都不知道该去相信哪些信息了。关于信息的秩序和体制已经变得难以理解，在我看来我们正处于秩序重建的过程中。而重建之后的新秩序会是怎样的？对于这点我也不是很清楚，也无法预见。不过，在这一点上，各大平台企业的作用应该会很重要，因为在日本 YouTube、推特、雅虎的影响力非常大，还有就是人工智能（AI）。在事先发给大家的材料中我还写了国家培育民意的办法，比如，如果选举制度发生改变，政治和历史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无法预知社会将如何变化。如此一来，那么历史学应该如何改变，也就会是个非常难以言明的问题。

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指定讨论 3



韩国“公共历史学”的现状与课题

沈哲基

延世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龙日（东京大学）]

大家好，我是刚刚承蒙介绍的沈哲基。以历史大众化为主题我写了对韩成敏老师报告的评论文章，但中心内容是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思考的问题，那我开始读文章来进行我的评论。

“历史大众化”是韩国历史学界长期讨论的主题。意思是要让历史与大众在一起，而不是成为少数几位历史学家的专属物。这样一来就催生了历史消费，博物馆、纪念馆等也开始策划丰富多样的项目，邀请专家共同参与。但博物馆、纪念馆举办的这些活动中，以专家仅参与一次的项目居多。因此，博物馆、纪念馆为了常设展的正常运营寻求了其他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依靠短期速成培养的讲解员和导览员来开展相关项目的讲解工作。

这些项目虽然受到好评，但也出现了很多副作用。这些项目大部分以学生和一般大众为对象，就像韩成敏老师说的那样，因其本身缺乏内容性，于是多以煽情和过度的民族主义观点，亦或是通过煽动爱国心的方式等来进行补足。他们没有客观地介绍专业历史，而是通过诉诸民族感情的煽情讲述将因知识储备不足而无法解释的部分蒙混过去，这导致了許多普通大众对相关历史产生误解。

另外，在历史消费方面备受关注的是历史内容。从向大众普及历史时的易接近性这一点来看，其具有积极的一面。但正如韩成敏老师所指出的那样，因其以兴趣为本位，会出现错误的事实被传达，最终导向过度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情况。在韩国以历史内容为主题制作的综艺节目，出演的讲师中已有数位引发了争议。

历史学界对这些问题不断提出质疑，但并没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好对策。最近作为对策被提出来的便是公共历史、公共史学。这被认为是解决韩成敏老师所指出的历史学危机、史学系的存续、毕业生就业难等现实问题的对策。作为应对危机的对策，韩国学界已开始有所行动。即：将历史学区分为“学术史学”与“公共史学、公共历史”，分别在学术领域和大众领域展开。现在普遍的共识是，以大学为中心进行学术史学，而面向大众则进行公共历史。

但我认为韩国历史学界、韩国社会还没有对公共历史学进行明确的概念整理。为了将公共历史学作为解决历史危机的替代方案，我认为有必要对公共历史学进行明确的概念整理。韩老师的提案文中也有对这一点的认识，但在提案文中省略了相

关具体内容，所以希望韩成敏老师能介绍一下，您认为的韩国公共历史学的概念和主要内容，谢谢。同样，希望日本和中国的老师们也能谈一下，各位认为的公共历史学的概念是什么，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沟通。

我认为，公共历史学的概念整理有助于改变对当前历史学界的看法，为克服历史学面临的困难提供解决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和那些活跃在公共历史领域的相关人员，如博物馆馆员、作家、教师等现在被称为“公共历史学家”。我认为，如何与他们建立联系，现在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如何设定从事学术史学的学者与以此为基础讲课的博物馆馆员、写文章的作家等群体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理解历史学者所认为的公共历史和公共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公共历史分别为何物，并从中寻找共识，这对今后确定公共历史的意涵也非常重要。我想听听韩成敏老师对此的想法，也想听听其他老师们的观点。

另外，我认为有必要对公共历史学家推进再教育。如果韩成敏老师也认为有必要对公共历史学家推进再教育的话，那么系统地进行再教育，您觉得要推进的核心事业是什么？如果不对博物馆馆员、教师、作家们就其熟知并学习过的历史学进行再教育，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对历史学最新的研究动向和讨论热点不够了解，因此就有可能给大众传递错误的信息，所以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我想问大家，这些究竟以什么样的体系实现会比较好。

最后，公共历史在欧洲和美国似乎是在学术领域被提及的，所以在欧美似乎可以看到公共历史学的存在样态。我想听听大家对以下几点内容的看法。首先是公共历史作为学问能否成为公共历史学，如果成为学问领域，应该如何区分历史学、公共历史学、公共历史。作为刚才所讲内容的延伸问题，如果公共历史学能够成为历史学的话，那么我想请教大家，大学是否可以把公共历史作为学问来研究和教育。

虽然还剩一点时间，但我想说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

对指定讨论的回应

韩成敏

高丽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龙日（东京大学）]

好的，谢谢三位老师的讨论。老师们的问题果然还是集中在公共历史上。首先，中国的郑老师以自身的事例和案例研究为中心，最后提出了公共历史是否可信，能否将历史交给大众的问题。

但我认为将大众设想为历史学家，这件事本身并不是公共历史。这也与村老师的提问相关，我对历史学怀有自豪感，一样有想要守护的心情。在历史中我们应该处理的内容、对史料的批判及保存、应该得出何种结论等，如何在这三方面努力取得平衡的基础上进行考察，基本上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发生了变化，那就不是历史学了。我想说的是，我的问题意识是在遵守历史学原则的同时，历史学是否应该根据当前的时代状况做出一些改变。

沈哲基老师具体提出了有关公共历史的问题，大概有五个：第一个是公共历史的概念。公共历史的概念非常多样，专业的公共历史始于美国。在美国，公共史学是围绕着史学系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而开始启动的。与此相反，澳大利亚的公共历史是对既有的大学的历史学的反抗，即是对拥有既得权威的历史的批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再来看一下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公共历史在法国是作为国家的项目推进的，奥地利或其他国家则是大众通过群众外包（crowdsourcing）进行资料收集并做简要描述，以此形式公共历史得到发展。所以在不同的国家公共历史的意义可谓大相径庭。

但我认为，公共历史、公共史学等利用历史内容与大众进行沟通的过程中推进的一切都可以说是公共历史学。如果说对大众的演讲等是较低层次的消极的公共历史学的话，那么大众可以直接参与的项目就是积极形态的公共历史学。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学者与在公共历史领域活动的博物馆馆员、作家、教师该建立怎样的关系。我认为在我们的历史学中，中间阶层是非常薄的。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需要有在中间起到媒介作用的人。可以说拿着历史内容直接应对大众的代表性群体就是教师，他们在学校受过专业的历史学培训并取得了教师资格。

以音乐为例的话，在韩国直接接触乐器或集中学习音乐的最初体验通常发生在私人的音乐教室。在音乐教室学钢琴或小提琴的时候，给予指导的并不是学校的教

师。你不能说他们不是音乐家，但也不能说他们是专业的音乐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教的不算是音乐，或者是脱离了音乐形态的音乐教育。

随着这样的人数量的增加，音乐的基础也在扩大，在接受这种教育的学生中，有成为专业音乐家的，也有人把音乐作为兴趣继续从事相关活动。向能够以多种方法与大众直接沟通的人们提供内容并持续培育其专业性的正是历史学者。历史学者也可以成为公共历史学家，美国规定的公共历史学是指发生在校外的与历史相关的全部过程。在校内教学生的时候是大学教授，但在外面进行大众演讲或者向大众进行历史性解释的时候，就能说该历史学家是公共历史学家。不能把公共历史学看作是和历史学对立的观念。培养能专业应对大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学家，从而提高大众的历史素养，这些才应该被认为是公共历史学概念的应有之意。

针对这样的公共历史，有必要对直接接触大众的讲解员和导览员进行再教育。有的讲解员和导览员仅靠最初那次的短期速成培训，就基于错误内容从个人情感出发向大众持续讲解 10 年、20 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定期对这些群体进行再教育。美国有对研究生开设的公共历史课程，所以，如果大学内有公共历史学课程当然最好不过，哪怕不是正规课程，我认为也应该向想要继续从事讲解或导览工作的人员开设公共历史课程，比如每隔 1 到 3 年举办一次，不论是以何种形式，都能为他们提供持续再教育的课程环境。

那么应该如何区分历史学和公共历史学呢？其区分并不明确。从历史学的本质来看的话，比起本科，公共历史学课程在研究生院开展更为合适。历史学与公共历史学有很多共通之处。即便存在与大众直接沟通交流的问题，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公共历史学也可以做到高度专业化。关于能否将公共历史作为学术在大学进行研究和教育的问题，我认为具有充分可能性的。在内容方面可能案例研究会占课程的大半，而如何提高大众的历史素养可能会成为一个难题。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在教育课程中完全可以得到解决。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老师们提出的主要问题，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会再回答，谢谢。

第2场

自由讨论

主持人：南基正（首尔大学）

论点整理：刘杰（早稻田大学）

成员：问题提出者、讨论者、国史对话项目参与者

[以母语发言。中文翻译：于宁（东京大学）、韩语翻译：洪龙日（东京大学）]



南基正

大家好。第七届“中日韩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会议的第2场即将开始，我是这场的主持人南基正。现在在首尔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日本的政治、外交、韩日关系等，同时也在做史料研究。在前几届的对话中，我学习、体会到了很多，今天会议的重点是想关注历史大众化的问题及其可能性。在第1场，针对在中日韩之间能否创造出公共历史提出了问题，各位老师对此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并对提问做出了回答。

因为刘杰老师会再次指出论点，所以我似乎没有整理的必要。第2场到韩国和日本时间的16点55分为止，所以时间不是很富裕。再加上是自由讨论，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参加讨论，我就尽可能地专注于做好控场的工作。

接下来就进入刘杰老师的论点整理环节。希望正在等待中的在自由讨论中进行指定讨论的中日韩三位老师，尽可能以刘杰老师整理的论点为中心进行讨论。也烦请以上三位老师能整理好刘杰老师的论点，重新展开问题。那么，先来听一下刘杰老师的论点整理。

论点整理

刘杰

谢谢南老师。我现在把画面跟大家共享，然后我来讲。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吗？

我刚刚归纳了一下各位老师发言的内容。这次是我们的第七次“国史对话”，我们这次讨论跟历次的“国史对话”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没有请各位参加讨论的老师事先做论文的准备，而是直接进入讨论的环节。这样的讨论也许是一次比较冒险的尝试，尤其是这样在网上对话，风险会比较大一些，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对话会增加彼此的互动性，各位的意见能够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

“国史对话”中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说到底东亚的历史问题。这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们的对话是为东亚历史认识问题寻找原因，并且为历史问题的解决提出一些方案。但是由于我们都是历史学者，我们考虑问题基本上是从历史资料，或者历史研究的方法等角度来接近这些问题。然而，在几次的“对话”中我们发现历史学者遇到了一些历史学者难以克服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刚才韩老师、郑老师、村老师还有沈老师已经讲到的问题。我把它归纳成三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历史学者难以克服的问题”，就是作为历史学者，我们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具体来说，历史问题经常是以政治问题的形式出现，历史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政治对历史学经常产生某种制约，甚至对历史学造成严重的破坏。而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说有哪些表现形式？各位老师刚才已经讲到了，第一点，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历史的解释权并没有掌握在历史家的手中，它受到很强的政治的约束。第二个问题是历史与爱国的问题。历史学者经常会被推入你是否爱国的困境。他们会经常感觉到爱国的“正义性”和历史的科学性有的时候是不可以两全其美的。另外，刚刚各位老师讲到了历史的大众化的问题，也是我们这次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很多的“正义性”是来自大众的。面对大众的“正义”历史学家的能力和力量往往也是非常渺小的。这是历史学家难以克服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刚才各位老师已经讲到的历史的大众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伴随着史料的数字化和透过网络的公开，大众更加容易接近历史。这就产生出了大众的历史和专家的历史、学者的历史之间的巨大的鸿沟，如何去填补这个鸿沟，这也是一个艰难的问题。另外作为学术的历史学，现在无论是在大学还是研究机构，都处于低潮的状况。而这一低潮的状况也许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这也是历史学者难以克服的问题。

第二类问题是“历史学者尚未充分对应的问题”。作为历史学者如果我们用心去对应的話，也许是可以找到一些答案的。这里面包括哪些问题呢？比如说各位讲到的关于口述历史的构建和利用的问题，在口述历史的可信性、普遍性和作为历史史料的历史性等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另外关于感情记忆的问题，是否可以把感情记忆历史化？在大约二十年以前，中国和日本之间有过知识共同体的对话，那个时候的对话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感情的记忆变成历史。第三个问题，对于大众史学对实证史学或者说学术性的史学所提出的疑问，历史学者其实并没有从正面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是历史学者对整体社会的影响力问题。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所获得的成果，并没有被社会充分的接受。

第三类问题是“历史学者还没有找到最佳方案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如何书写全球史，所谓的 Global History 的问题。另外还有各位老师刚才已经讲了很多的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 的问题、它的有效性的问题。另外还有历史学者和社会的接触的问题。比如说在博物馆或在史料馆里工作的准历史学者，历史家如何和

他们进行交流？这些也是还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

所以归纳起来，第一是历史学者难以克服的问题，第二是我们历史学者的努力还不够，因为努力不够而没有做到充分的对应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共同研究的问题。我想主要从这三个大类的分类来对各位老师刚才提出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和梳理，那么也希望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对这几个问题，请各位参会的老师展开积极的讨论，谢谢大家。

自由讨论

南基正

刘杰老师，谢谢。据我的理解，您提出了三个大的课题或者说是论点。首先是，历史家需要克服的历史和政治问题；其次，还提出历史家尚未能够应对的问题；最后，就是历史家还未找到最优解的问题，例如，如何书写全球史等。就这些课题提出了问题。

可以理解为是在第1场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更大的问题。对此有三位指定讨论者发言。我们听完三位的讨论后，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进来。平山升老师、毛立坤老师、金滢老师，请三位在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提出新的问题，也可以对之前提出的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就不对各位老师一一进行单独介绍了。请发言人进行自我介绍并请使用母语发言。因为目前没有事先共享的内容，所以希望尽可能慢速、清楚地讲，以便保持翻译顺畅。

那么，首先有请平山升老师。发言时间请控制在7分钟左右，尽量不要超过10分钟。

平山升

我是神奈川大学的平山升。对韩老师问题提出的阐述，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刚才村老师谈到了“日本当下正在发生的事”，而我作为日本近代史的研究者，想谈一谈“日本（过去）发生过的事”。简单来说，由于新媒体的普及造成了学术型历史学输给大众感情的历史，这其实在战前的日本就已经发生过了。

我认为战前日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学术型历史学输给了两个对象。

第一是输给了“令人感动的故事”。

正如村老师说的，从江户时代起，煽动大众情绪的英雄故事就非常受欢迎。而近代以后，随着爱国教育的普及和媒体的大众化，这种受欢迎程度达到了空前绝后的规模。历史学者对部分英雄的存在产生质疑（或进行否定），民众对此有所反对，咒骂这些历史学者是“抹杀型博士”。

具有象征意义的便是发生于1911年的“南北朝正闰问题”（※“正闰”即“正统”之意）。具体内容在此略过，简而言之是当时在以普通大众为目标读者的报纸刊登了一篇评论，引发了舆论沸腾甚至演变成了政治问题，最终还发展到编纂教科书的历史学者被处分，教科书内容被改写的地步。

第二是输给了“体验”。

尽管历史学者对它的实存性存疑，但对这种“令人感动的故事”牵强附会的“历史遗迹”或“圣地”（具体来说，如纪念碑、神社等）依然被大量建造。随着铁路等近代交通工具带来的观光业规模的扩张，走访这类场所，“体验”其中氛围获取

某种感知历史情绪的倾向也随之扩大。这不仅对普通大众，对知识分子们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上述两点告诉我们，“教育、媒体、移动的大众化（民主化）”是近代化的一个重要侧面，但讽刺的是，它同时也导致了压迫学术型历史学的后果。此外，这两点均与媒体、观光业等商业主义紧密相连，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如此，韩成敏老师在问题提出中指出的发生在现代的历史学与大众社会之间的困难关系，其实在战前日本就已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了。我认为在现代，包括历史研究者在内的很多人都忘记了这段历史，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

对于我们历史学者现在面临着的困境，思考当下的状况固然重要，但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各位毕竟都是历史学者，我们需要认识到现在的状况并非是首次出现，极度类似的情况在近代日本已经发生过。我认为要在共享这个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推进我们的讨论。

以上就是我的点评。谢谢大家。

南基正 好，谢谢。以日本的历史学，特别是战前的历史学为主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论点。学术型历史在战前曾有过失败的经验，这似乎是在提出有必要以感动的故事体验重新回顾失败的历史的问题。接下来是毛立坤老师从中国的立场做点评，有请毛老师。

毛立坤 各位来宾，各位先生，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学者，我叫毛立坤，我将用中文发言，希望同声传译为日语和韩语。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接触到历史学的大众化这个议题。由于我在学校里讲授中国近现代史课程，自己也做近现代城市史方面的研究，那就结合自己的感受，来粗浅地谈一谈自己对历史学大众化这一议题的认知和感受吧。

第一，我深切地体验到公众、大众对于近现代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还有历史规律非常感兴趣，这是他们在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比如近现代历史上的多次战争、运动，像与日本相关的中日战争，与韩国相关的抗美援朝战争，此外还有新中国建立以后发生的历次运动，比如土地改革运动，还有集体化运动，知青下乡、文化大革命，这些往往会成为公众在茶余饭后的谈资。虽然他们不一定会触及到特别敏感的问题，特别专业的问题，因为他们也不一定知道，但是都能够说来自己在这些运动、事件、战争当中的一些经历和体验，也能表达自身对这些事件的看法。从中可以听到很多与主流媒体、主流观点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一个学生就注意到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河南农村妇女的自杀问题，像这种问题是不可能出现在权威机构、权威媒体的报道当中的。他是听周围的老人说到这个问题之后，他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然后据此撰写了博士论文，写得也是非常精彩，揭出了一段很隐蔽的、也很痛心的历史，就是农村妇女想通过离婚等方式求得解脱不行，最后实在走投无路，自杀了。他选择了这个上个世纪50-60年代河南农村妇女的自杀问题，写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那么这样一个选题，我觉得是和大众史学密切相关的，这是他周围的人给他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做深入研究之后写出了这篇博士论文。

那么另一个和历史的大众化密切相关的，也是我切身体验到的一个现象，就是

娱乐性的历史话题，在中国年轻人一代当中特别受欢迎。有很多年轻的白领，他们在下班回到家以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做饭，而是去追剧。他们要把在白天没有顾得上看的电视剧赶紧上网追一遍，这个现象在前几年，所谓清宫穿越剧热播期间特别火。虽然这些所谓的清宫穿越剧和历史真相明显脱节，一看就是假的，完全就是把现实生活中的经历给移植到历史剧当中去。可是这样的电视剧却牢牢地抓住了中国年轻人的心，导致他们在下班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追剧，说明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喜欢这些含有较多历史元素但是确实又在影射现实的电视剧。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释放自己心中的一些压力。这是年轻人群体他们对历史感兴趣的一个接触点，他们喜欢这些娱乐化的历史。

年龄比他们大的中老年人群体，特别是连续好几代人同时居住在一个区域的大家族的成员，则会津津乐道地谈论那些含有他们共同生活记忆的地方社会的演变史，还有家族的传承史，还有一些本地著名人物的活动。他们试图通过串联这些亲身经历的往事，来寻找与亲朋好友和街坊乡邻的集体记忆，这原本只是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个现象。不过可喜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历史学生，他们在利用寒暑假回家探亲的机会，来整理家中老年人、长辈对他们所讲的这些口述历史的记忆，进而抢救出一大批原本可能湮没的历史资料。

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在中国就是这么热起来的。因为现今中国的这些50岁到60岁的这一批人，他们幼年的生活经历都比较苦，他们赶上好日子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所以这批人热衷于回忆他们生平最珍贵的这段岁月。我见过的一个学生，他写了这样一篇论文，叫“春运四十年”。这篇论文细致呈现了不同时代的人，每年春节回家的时候是怎么从外地回到自己老家的，早年是怎么辛苦，怎么费力，而近年来坐高铁又是怎么方便。所以，你看这样的选题，它也和大众生活密切相关，这也是今天这个会议的议题，历史的大众化在我接触到的学生当中有一诸多反映。

还有一类青年学生也很独特，也是我年年都能接触到的，他们原本的学习专业并不是历史学，而是其他专业，甚至是理工科的专业。可是这些学生在考研究生的时候，选择专业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哪怕失败好几次，也要选择读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这种现象每年我都遇到过。那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学生要抛弃了原来的专业，转过头来要读历史学专业呢？我问过一些学生，他们大多是这样说的，出于对某些历史现象或者某个历史人物，或者某个历史问题的着迷的心理，就想通过继续读研究生，来破除自己这个着迷的心理，来破除心中的疑惑，至于说为了这个追求付出怎样的代价，付出抛弃原来专业的代价，在他们看来都不在乎，觉得是值得的，这也是历史学特定问题能抓住年轻人的心的一个表现。

好的，谢谢各位，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

南基正

谢谢。您对中国的近现代史，特别是一代人普遍共有的战争和大众运动的体验，大众是如何定义历史的生产、流通、消费等方面提出了问题。能读出这与平山升老师刚才提出的问题有着相似的关切。从评论中可以感受到戏剧性的情节或能够超越世代而被共享的体验等，这些似乎都与历史的大众化有着密切关系。接下来是第三位指定讨论者，有请金濤老师。

刚才毛老师发言的时候，有些内容尚未来得及确认，如果方便的话，请将关键

词输入到聊天窗口，会有人翻译，核心概念可以在聊天窗口进行共享。那拜托金滢老师了。

金滢

谢谢南老师。我是首尔大学亚洲研究所的金滢。目前正在学习韩国近世史，我主要以18世纪为中心，研究其前后时期的历史。非常有幸可以参与在中日韩之间均成为问题的历史、公共历史或大众化等问题相关的讨论，我想我应该会从中学到很多。

我临时给负责翻译的老师写了报告内容的梗概。我认为历史的大众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主要研究朝鲜王朝后期的历史，18世纪的学者丁若镛在自己对中国典籍《尚书古训》的注释书中引用了孔子的故事。他提到如果财富和教育的主导权不在国王手中，而是向下发展的话，政治就无法成立。国王，即最高领导人有义务掌握作为生活基础的财富，并通过这些将土地之类的财富分配给人民，只有提供经济基础才能更好地施政。另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要控制教育，作为价值判断的最终决策者，国王的权力不仅只针对物质基础，还是精神价值的最终判断者。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东亚历史学一直是对前政府或过去做出最终判断的产物。这似乎与领导人拥有解释、决定和判断这些的权限有着很深的关联。刚才就历史家和政治问题进行过讨论，我认为这在东亚是最核心的问题。

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强调“春秋”的原因也在于此。事实上，如果是国家的观点整理历史，个人的新挑战可以说是不被允许的。国家掌握了春秋的是非原委，但从韩国史和朝鲜历史来看的话，很多知识分子挑战了国家编纂的正史。他们对国家完全垄断春秋的是非原委进行了批判，就是说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很多知识分子意欲参与其中。刚才也提到了日本的近代史，大众想要参与历史的欲望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存在，历史也是与之一起发展至今的。

当今我们通常会谈到大众社会。大众社会可以说是大众欲望的普遍化，与过去相比他们作为政治主体的自觉已经扩大到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状态。互联网消解了信息的不对称，开启了几乎人人都能轻松接触优质信息的局面。我认为，正如1931年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Carl L. Backer）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的状况在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后或已实现，而“每个人都想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欲望正是公共历史学的核心。

我认为，公共历史学的核心和大众社会的核心主题，并不在于传达某人整理的知识，而是“我想成为叙述历史的主体”的欲望。千人千面的叙事，千人千面的历史，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大写的历史（History），而是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成为可能的情况。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太担心这些就将其称为“仿史学”或“伪史学”。因为这是我们所面对的大众社会赤裸裸的现实，所以我们没必要太害怕。与此相对，大学以大众为对象，提供适当的教育和授课方法，以及历史学家的伦理和方法才是关键。

我认为，与其说当下是危机，倒不如说是机遇。大众的历史欲望，即作为历史叙述主体的欲望越是增强，历史学就越不应该把它当作危机，而是应该把它当作机遇。因此，早在几十年前，美国和德国的大学就开发了公共历史课程，积极在大学推进。据我所知，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公众历史学进入

了大学制度圈。在我看来，日本和韩国是最近才开始考虑这些问题的，因此起步相对较晚。两国对公共历史学的概念还存在混乱，韩国将其命名为“公共历史学”，而日本则干脆直接以片假名外来语“パブリック・ヒストリー（Public history）”来表达，侧面反映出了这一状态。

由此，我认为德国的经验非常重要。从马丁·卢克（Martin Lücke）的《公共史学》一书来看，公共历史学的重要价值最终应该是以刺激以叙事为中心的历史想象力的方式，以及维持多元观点的方式来进行构成，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比起以知识为中心，让大众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发挥历史想象力，同时维持多元观点而非单一主张，这样的教育才是公共历史学的核心。为了维持这三个要素，要承认种族、阶级、性别的多样性。并非助长它们之间的对立，而是保持包容的态度才是公共历史学中最应该追求的价值。我认为这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包容的态度真的非常重要。

回溯到18世纪的朝鲜，丁若镛的后辈学者洪吉周就提到过当时朝鲜的儒学家们把儒学范围定得太窄，并且存在排斥非儒家的氛围，洪吉周对规定“历史就应该是这样”来排斥其他观点的态度进行了批判。洪吉周的主张是，如果过分狭隘地强调正统儒学，就有可能把其他的东西都变成异端。因此，他主张儒学家应该保持无限包容的态度。

我不想承认“仿史学”或“伪史学”这些词汇，因为我觉得这些词汇本身之中就有区分正统和异端的宗教心理在作祟。当然，也是有“无法忍受的程度”存在的，这也是我们应该要警惕的。比如，过分追求商业化或过分介入政治而引发问题，以及极端的历史修正主义等，这些可能会在历史解释方面引发问题。在这些方面今天已经有很多老师表示了担忧，我也对此很担心，但我认为不能因此就制造“伪史学”或“仿史学”这样的词汇来试图排斥其他。

最后，要知道朝鲜国王正祖是热爱学问的领导人，他曾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与自己的官僚们讨论过经典。我在准备这次讨论时想起了一段话，想引用给在座的老师们听。正祖曾有一次边读《孟子》边讨论书中的某段内容，在讨论仁义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官僚知识分子”士大夫们说过这样的话：“说不该说的事罪小，但不说必须说的事罪大。”

对于那些不将该说的都说出来的罪大恶极的人，正祖将他们称为卑贱的人——“鄙夫”。他曾对官僚们说：“你们会成为一个鄙夫吗？把必须说的说出来，这才是知识分子的任务。”对于包括公共历史学在内的所有历史学者，不要去研究那些不该说的、没有必要去研究的事情。而对于必须说的事情，则要坚持一种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去表达的见识和勇气，这样就无需担心“仿史学”或“伪史学”之类的东西了。我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该说的都说出来，而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见识的，所以只需去培养这种态度就足够了。

我想把今天发生的历史学危机视为机遇，并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与其他历史学家共享这些态度的问题。谢谢大家。

南基正

好的，谢谢。您指出历史大众化是必然趋势的观点，并认为历史大众化并非历史学的危机，而是可以成为开创历史学新机遇的现象。此外还指出了包括公共历史或历史的大众方法在内的历史家必须考虑的最重要的核心态度。

村和明老师在发言中，有提到过执着于琐事（Trivia）或小故事的问题，我觉得与这些有相通的地方。三位老师分别站在韩国、日本、中国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再次指出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

例如，金滢老师在评论的最后表示，韩国与日本在历史的大众化和公共历史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似乎晚了一些。如果在公共历史的领域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的话，那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另外，一边强调不必畏惧历史大众化且有必要接受，但是又指出某种程度上划定边界线的必要性。这不仅仅是金滢老师，而是所有老师都指出的内容。我们有必要确认这条“线”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不能越过这条“线”，这才是我们真正思考历史的关键点所在。

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到这些相关问题的讨论中。虽然现在很想给所有参加者发言的机会，但为了尽可能地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所以希望各位尽量把时间控制在5分钟左右，指出各自的核心内容。发言的时候请使用母语，并提示自己的所属单位和姓名。如果是特殊用语可以多加说明，有核心关键词的，希望能做好讲解，帮助大家能理解到位。

那从谁先开始呢？在画面上可以举手，因为我无法看到所有人，所以请按举手的按钮，或者在聊天窗口上写上名字，我就可以进行确认。好像现在还没有举手的人，刚才盐出老师说，若时间允许希望能进行点评，盐出老师现在可以发言吗？

盐出浩之

我是京都大学的盐出。韩成敏老师，感谢您的报告。我对韩老师提到的危机感同身受。

之所以会如此我认为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所谓历史，指的是讲述过去的行为和实践本身，亦或这种行为的全部。所以在我看来，历史被故事化或者成为消费的对象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我和韩老师的观点不同，由历史学者垄断历史叙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村老师也提到了，我认为哪怕在过去也并没有存在过这种垄断。

倒不如说，大众（或者说非精英）开始像现在这般表现出对历史的高度关注，是之前的时代不曾有过的。刚才金老师也谈到了，从这个层面看，对历史学者而言反倒有可能成为一个机遇。

所以我认为问题的所在，倒不如说是通常被消费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国家的历史这个事实，或者说，只有那种在学校学习的历史成为了消费的对象。

也就是说，对于过去，本来可以有各种讲述形式的，但结果只有那种在学校学习的国家的历史作为所谓的历史成为了被消费的对象，我认为这才是问题所在。关于这一点，正如郑洁西老师和毛立坤老师介绍的那样，让普通人或大众主动讲述自己的历史，亦或是请他们来讲述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一举措为填补历史和历史学之间缝隙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比如，在思考自己的过去时，现在的记忆和过去的日记，到底哪一个更具有可信性呢？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够理解“资料”的意义了。所谓历史，就是如何处理过去，我认为要想让大家理解这个问题，以上述方式让大家思考自己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向郑老师提个问题。郑老师的专攻是明代史，那么关于中国社会中的大众历史消费，您是否有特别关注的问题或者觉得哪些问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南基正 好的，谢谢。虽然现在有具体的提问，但在此之前佐藤老师好像也做了评论。佐藤老师，如果您现在可以的话，能讲一下吗？

佐藤雄基 我是立教大学的佐藤。我今天听了各位老师非常重要的讨论发言，感受颇多。大家的发言带给我很多思考，请允许我谈两点我意识到和比较在意的问题。

第一点是关于村老师的点评。村老师指出，“不信任专家，专业知识的权威正在崩塌”这不只是历史学家的的问题，也是学术研究整体面临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以专业“医学”为例进行了思考。在医学方面，民间疗法，江湖医术等与金钱问题捆绑在一起，非常的兴盛。结果，给上当受骗之人的健康和金钱方面带来了许多伤害。当然，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但与此同时，我认为民间疗法有时也会成为因患上不治之症而苦恼人群的“希望”。

在认识到这些“医学”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再去看待伪科学式的“历史”普及扩散的问题时，我认为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论点是：它具体带来了怎样的伤害。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大众性历史、伪科学式的历史都有问题。刚才讨论中也谈到，这种历史大众化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就如同民间疗法那样，对某些人来说，说不准有时候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希望”。如此一来，那历史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就能更加明确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宽泛地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而是要明确伪科学式的历史给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具体带来了怎样的“伤害”。我认为只要弄清楚这个“伤害”的样态，就能更好地明确专业历史学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职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公共历史”问题。像历史教育、博物馆馆员的活动、历史小说作家的创作活动等长久以来一直都有。我们现在以“公共历史”概念将其可视化。对历史学的研究者而言，这应该是有利的。

那么，对于被历史学家重新定义为“公共历史”的一方，即从事历史教育或创作活动等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好处呢？比如，中学或高中的历史老师，与历史学持有密切关系的同时，作为教育者也是教育学的专家。我对韩国和中国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就日本而言，学习教育学或其他专业的非历史学专业出身的人担任中学历史老师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还在增加。也就是说，在历史教育的现场，比起历史学，教育学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我认为这是日本的现状。

历史小说家也是如此，他们在承担历史工作的同时，作为小说家他们首先是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关于历史学和公共历史的关系，我感觉大家都倾向于从历史学家的视角出发，将历史学看做是指导者，而公共历史则被看做是接受指导的一方，但这种认识是以历史学家为中心的。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包含历史学在内的各种不同的领域，如历史、教育、小说等多个专业领域共同驶入的一个区域范围。如此一来，我认为不应该只是单纯讨论历史学，而是有必要去了解像是教育学或文学（小说家）一方的想法，以及多个领域之间的合作关系。而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域，我其实是很期待能够邀请这些领域的人来参与讨论的。

对此，我想就历史脉络稍作说明和思考。我认为在日本，历史学原本是历史教师以及博物馆馆员拥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从事这些工作的是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但是，日本现在的情况是，在博物馆馆员方面，出现了“文化遗产学”等新的专业，并逐渐发展为独立的学术领域，而 20 世纪中期以后教育学也发展成了独立的学术领域，所以非历史学专业的其他学科出身的历史老师越来越多，他们的影响力也越

来越大。

这么来看，我认为现在“公共历史”的问题正式成为历史学的课题，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现象，而是因为随着与其他各种学术领域（例如“文化遗产学”、“教育学”等）的关系发生改变，历史学已无法垄断由博物馆馆员和教师等所从事的“公共历史”，从而开始要求历史学去“重新建构”新的关系。而如何去思考这个历史脉络，我认为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看法。以上就是我的评论。

南基正

好的，谢谢。佐藤雄基老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民间疗法或欺骗性的治疗法，虽然会在健康和金钱方面带来损害，但也存在具有效用价值的部分，而将历史置换入这种情况之中的话应该如何思考”。另外，那些从事与历史相关的非历史专业的人，比如攻读教育学的，或是从事文学或文艺的人们，如果去观察他们从事历史相关工作的状况，就会发现目前的现象并非新发生的事物，因此如何重构其历史的形成已成为课题。

我在此仅仅是整理自己的想法，可能会与其他老师的观点有出入，所以仅供参考。现在聊天窗口里有一个提问，是陆薇薇老师向村和明老师提出来的。问题已经翻译成中日韩三国语言，请各位老师确认一下聊天窗口的内容。村和明老师，请您结合目前为止讨论的内容准备一下发言。宋老师举手了，您方便评论吗？宋老师从屏幕上消失了，那村和明老师您可以先评论吗？

村和明

我收到很多点评和提问，引发了我非常多的思考。因为我无法一一回复每一个人的提问，而且也在发愁回应时要怎么整理大家的观点，那我尽可能简单地做一下评论。

首先是关于平山老师具体介绍的日本近代的经验的问题，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在第1场的点评中，简短地提及了“应该思考历史学的方法”、“应该将专家团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历史进行思考”，这正是我想要谈的问题，而平山老师为我们列举了非常好的事例。

顺着平山老师列举的事例继续讲的话，我认为在日本，关注广义的 Public History 的专家并不多见。就连对这个概念本身“应该使用哪个词语”来表述，日本的历史学者们都尚未达成共识。所以，在我刚才的点评中基本也没有出现这类简短的词语和简短的概念。

在我收到的提问中，有人指出“在日本 Public History 最早并不是出现在历史学者之间，而是出现在民俗学”，我认为这个观点非常准确。

与平山老师介绍的事例类似，近代日本的历史学者在开展学术性的历史学研究时，尤其是在与天皇相关的问题上，遭受到了来自社会和国家的猛烈攻击。在受到这样的迫害后，日本的专家团体是如何回应的呢？简单来说，我认为他们选择了逃避。具体的研究史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他们提出“希望能尊重大学专家的发言”、“大学内部的事务由大学自己决定”、“专家要讨论的事项由专家自己决定”的言论，以这种形式建造壁垒，对于大学以外的社会中的历史观采取了不积极参与的战略。

当然也有例外。特别是1950年代，这个时期的例外非常多。这与刚才盐出老师谈到的民众的历史、地区的历史的问题也有关联。去到某个特定村落或区域，听

取当地老人们的讲述，研究当地的资料，倾听他们讲述历史，这种地区历史的研究者和非研究者共话历史的尝试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整体而言，现在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甚至可以说进展得并不乐观。

接下来我想谈谈“当前状况不是危机，而是机遇”的观点，这点金老师和盐出老师也谈到了。刚才刘老师整理出了三大课题，我认为就是区分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历史学者，虽然看清了方向却未能顺利前进”的状况，第二个是“尚未决定前进方向”的问题。如果参考这个整理方式的话，那我认为危机和机遇并不是对立的。我认为这是历史学的危机，但这个危机同时也可以被看做是机遇。我们要再次回想“历史学者一直在回避什么”以及“历史学者选择了什么”，要对“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以及“我们无法认同的价值观又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省，亦或做出改变。我认为这两者是可以共存的。

在此基础上我想再谈一点，不过这一点我自己还没有整理好。关于专业的历史学家与专家以外的所有人能在何种程度上共同讲述历史，我对这一点是稍稍持悲观态度的。

讨论必须基于事实，说不定对这个原则可能会达成共识。但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作为事实，确实没有撒谎，全部都是正确的事实”，但“排列组合的方式与选择可以编织出巨大的谎言”，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如此一来，为了什么而讲述，为了哪个结论而讲述，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价值观不同的话，我认为就可能会出现无法共同讨论的部分。

比如，刚才金老师介绍了德国的案例，讲到了价值观多样性的重要性，对此我完全赞同。但也有人不这么认为。比如有人脑子里认定日本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认为韩国人是低等的。有这样想法的人哪怕他们引用的资料都是事实，我也认为我们很难做到跟他们一起共同推进思考。

所以，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们必须确认各自持有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基于这个差异就一定会出现可以共同思考，以及完全无法共同思考的人。

接下来我要谈最后一点。佐藤雄基老师举出了医学的例子。错误的医学知识会给人们带来伤害，我对此完全认同。这是解释伪科学危害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错误的历史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伤害？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简单来说，我认为它会带来社会的分裂，这刚好与我们这次的对话企划的目的背道而驰。结论早已定好，只一味追求感动，于是这个过程就会变成集中寻找敌人，还有就是寻找能够满足自己的自尊心的东西。对这样的人来说，伪历史学非常具有吸引力。历史既讲述世界，也讲述自己和他人。我们是谁，他们又是谁，我们和他们是什么关系，历史讲述的正是这些。但如果其中充满了导向特定政治结论的诱导，亦或是只以一时的快感为目的的发言的话，就难以形成对话。这样在自身内部会逐渐建构出一个顽固的敌人，并逐渐发展成愈渐凶恶的存在。我认为这是关乎维持今后的社会和世界的秩序的重大问题。

例如，美国总统大选后发生了暴动，围绕这次新冠疫情也出现了一些阴谋论，认为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邪恶组织，试图通过疫苗来控制人类，而这些情况与伪历史学有着高度的亲和性。这便是我所认为的不仅无法与之共同思考，更应该与之对抗的对象。

那么我们专家研究的历史真的就完全不同于伪科学吗？我们讲述的历史具有权

权威性，但其中是否也存在着在无意识层面被国家或某种权力利用了的面向呢？

我好像一直在强调分裂这个点，但其实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哪些事情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以及我们必须守护的价值是什么。

因为时间有限，很多提问我都没能来得及一一回答，真的非常抱歉。我占用的时间有些长了，还望见谅。谢谢大家。

南基正 村老师提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即使历史的大众化有可取之处，但也应该在某些地方划定边界线，我觉得村老师刚刚的发言就是从这个立场进行的，不知道其他老师是怎么认为的。宋老师好像回来了，不知道您能不能进行发言，那有请宋老师。

宋志勇 非常感谢。我刚才看了一下参加我们会议的人数已经有 70 多人了，所以非常高兴。我还是简单来谈一些，然后余下的时间留给其他的老师和同学参与讨论。

我先谈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大众化的例子。不久前，我腰疼，到一个医院去看骨科的大夫。当这个骨科大夫知道我在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时候，他一口气给我讲了十几分钟他对中日关系史的观点和看法。从我的专业判断，他讲的很多内容都不是很准确的、客观的，但是他的想法在社会上还是比较流行的。当时我就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专业的历史学研究者非常无力、无奈。他给我讲完了以后，我问他，我的腰疼怎么办？他说没有好办法，你去贴一下膏药就完了，不到两分钟就把我给赶走了。

我们专业历史学研究者和社会的大众史学家们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在这里我就只谈一点，想谈一下历史学家、专业的历史学研究者对历史大众化的应有的态度。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历史学研究者，应该忠于基本的历史学研究规范，以及历史学家的自尊，还要遵循历史学研究的伦理，这是我们作为专业史学工作者必须要坚守的。同时我们应该积极地、主动地加入和融入到大众史学中，向大众史学传达专业的、正确的历史知识，回答社会对历史学的要求和需求。与此同时也取长补短，也从大众史学中汲取营养，因为大众史学的能量还是非常巨大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远不是我们一个专业历史学家所能够达到的。实际上他们有许多需要和值得我们专业历史学家学习和借鉴的。刚才好多老师都谈到了，现在历史学已经不是历史学家们垄断的行业，我想在未来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记述中，一定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和非专业的大众史学共同构成。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谈一点，谢谢大家。

南基正 好的，谢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各位老师现在的想法也各有不同，很抱歉未能在这里全部解决，光整理问题我觉得都有点不容易。

但是，要铭记这是中日韩国史对话会议。希望大家能考虑对话的可能性，将截至目前已经出现的问题进行个别整理。我们分别从韩国、中国、日本的现实中，确认了历史大众化的现实、经过、特征等。其中发现了一定的差异，也找到了共同的问题。这些差异和共同的现象在中日韩近现代史上各有一些不同的经过和发展变迁，我们有必要确认一下和这些历史变迁建立了怎样的关系。

其次是，假如将中日韩可以共同推进的“公共历史”作为主题，在比中日韩能够相互对话更大的意义层面上看，公共历史到底有没有必要。如果是有必要的话，存在怎样的可能性。如果有可能性的话，如何将其变成可能。我在想，以后我们是

不是应该谈论这些问题。

若是以今天讨论嘉宾们的发言为中心，整理截至目前的言论的话，我们会发现日本或许是因为有过去、战前的经验，对历史的大众化问题表现出非常慎重和警惕的态度。当然，也有持相反立场的讨论者。相比之下，在中国大众的历史非常活跃，能感觉到中国社会正在将其视为现实并且接受。

如果说，韩国方面提出问题的韩成敏老师持担忧立场的话，那么最后进行讨论的金滢老师则相反，他认为那些是必然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机会。每个人在个别层面上的立场略有不同，在三个国家内部立场也略有不同，因此很难达成一致，还望在第 3 场相关讨论能继续得到总结整理。通过已有的 7 届对话，我认为这为“中日韩国史对话”今后应该前进的方向提供了观点，那么第 2 场讨论就到此结束。

虽然还有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但由于时间限制，只能在此结束，请大家谅解。谢谢各位老师。

三谷 博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宁（东京大学）]

今天以“历史大众化与东亚历史学”为主题进行了对话。作为历史学家，这是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的非常困难的问题。韩成敏老师提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为我们做了详尽的阐述。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韩成敏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中日韩三国的各位成员也切实感受到了出于大众消费目的的历史对社会整体，尤其是对历史学专家们带来的深刻问题，我认为大家对此都做出了敏锐的反应。为此，我向各位表示深深的敬意。

但是，正如在第2场的论点整理中刘杰老师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思考历史大众化时，不可以只去单纯考虑大众和历史学专家，而是也要对国家和政府这个强大的权力进行考察。在这个方面，今天的讨论并没有取得太多进展。当然我也承认其中包含了非常困难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平山老师就战前的日本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之后村老师对此做了补充发言，但对于韩国和中国，并没有谈到相同的问题。我认为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当然，实际上要去讨论这个问题本身也是非常困难的。

再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韩成敏老师和村老师对于以大众消费为目的的历史所引发的害处，给出了非常多的关注。特别是韩成敏老师，借用他的表述，被称为爱国主义的固定的叙事模式有着将人们封锁其中的强大力量。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对此我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韩成敏老师将这种出于大众消费目的而被讲述的历史，称作是“伪历史”，即它虽貌似真实但其实是错误的历史。然后，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很多，作为有力的候补，韩老师提出了公共历史（Public History），之后就交由各位老师进行讨论。

但是，今天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出现了与之相反的讨论，即认为“大众的历史也有可取之处”。对此我虽然有些惊讶，但相应地也有受教的部分。然后金濤老师谈到说公共历史是让大众在历史中成为主体的宝贵机会。确实如此。一直以来，大众都只是被强制要求原原本本地去接受由国家决定的历史解释以及学校老师所教的历史解释，而这种被动的大众竟可以成为自己创造历史的人。这非常重要，确实是公共历史的优点。不过，金老师在这里举出的是德国学者的观点，期待了超越种族、性别、阶级的多元历史解释的出现。

遗憾的是，我做不太到那么乐观。前面也提到过，因为这种由大众自己创造的历史，大多数都遭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污染。要如何克服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历

史学者面临的共同课题。

之后，中国的郑洁西老师和毛立坤老师都讲到了学生们积极投身通过对大众的采访来创造大众的历史的工作，并谈到说这个做法现在很流行。这种口述史确实非常有意义，以前的历史学说白了其实就是精英们专为精英而写的历史，大众只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存在而已。以前的历史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口述史要好得多。但我认为它的范围还是很有有限的。

在我这种曾经尝试过与中国和韩国进行历史对话的日本的历史学家看来，面对国家所做过的事，我们个人被要求承担起这个责任的时候，作为个体的日本人再怎么谈论大众的历史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依然无法回避应该如何对国家层面的历史做出解释的这个问题。

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我确实也感受到了投身大众之中所书写的历史的重要意义。

再回到日韩两国，今天在场的各位基本都是从事学术史学的人，从这个立场来看的话，认为 YouTube 上讲述的历史非常令人头疼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在接受学术训练，要说其中最重要的教诲是什么，便是被深深植入脑内的“对史料的批判性解读”。日本的历史学自战前开始就受到德国历史学的影响，将史料批判认定为绝对价值。因此，我们看着入手的史料，最初的第一步便是质疑“这份史料有多少是可信的”，然后就如何对此进行测定展开各种思考便是第二个步骤。能够在无意识中自动去这么做的才算得上是专业的历史学家，这便是日本的日本史学所体现的意识形态。

如此一来，当出现了很多对自己不利的史料时也无法做到将其无视。可以说这简直就是赔钱的买卖。而那些在 YouTube 上讲述历史的人，他们完全可以无视对自己不利的所有东西，简直不要太轻松，这真的很让人恼火。

但我们不可以那样。面对那些在 YouTube 上讲历史的人，我们只能告诉他们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思考，质问他们要如何去处理那些明明存在的对他们不利的史料。

因此，从学术史学来看，以大众为目标的历史学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存在，但只是谴责它并不能解决问题。很多人都讲到了，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才是处于劣势的一方，我们的谴责完全没有效果。那还有其他手段吗？我认为手段只有一个，就是对话。我认为只能是从学术史学去接近那些从事大众历史的人。但是，我认为我们几乎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办法去接近那些在新媒体中讲述历史的人。但是，从传统上来说，不论哪个国家的历史学，从事学术史学的人与初中的老师以及博物馆馆员通常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起码日本的历史学者是这样的。因为自己教过的学生中有很多会去做初中的老师或博物馆馆员。

当然，这个联系的建立并不是体制性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我们日本的历史学者偷懒了。但是，也存在着“高大连携历史教育研究会”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通过高中和大学的老师们的合作，来思考如何推进高中历史教育工作。以大阪大学越南史专家桃木至朗老师和英国史专家秋田茂老师为中心，该组织已经运作了相当长的时间了。还有就是从今年春天开始的“历史综合”这个高中科目，为了编纂相关的教科书以及在教室中实际使用的教案、授课方法的方案等，大学老师也同高中的老师们一起正在做出相当的努力。把自己想出来的主意提供给工作伙伴

们，相互学习。我也参与了部分工作，听取老师们的方案，然后给出“这里这么修改怎么样”一类的建议。哪怕我以后隐退了，只要成立了组织，今后就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日本历史方面的高中和大学的合作以这样的形式开始开展，我希望今天参加会议的各位也能积极参入到相关的组织中去。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我认为文部科学省有必要编制预算，制定定期向初高中教师提供再教育服务的制度。我跟我的工作伙伴们编写了“历史综合”科目的草案并在日本学术会议上提了出来。当时我们也讨论了这种再教育的必要性，并将其写进了提交给日本政府的提案中，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可能是因为没有预算，但这让我们很为难。初高中教师平时忙于学生指导，基本没有时间去学习历史学的新学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那些坚持自主学习的人真的非常令人钦佩，但普通老师是无法做到的。所以，我认为每隔四五年，就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彻底学习的机会，比如利用暑假中的一个星期。我认为日本的学术历史专家应该要求文部科学省开展这项工作。

最后，韩成敏老师给出了提案，村老师也给出了建议，就是在大学的普通的历史学课程之余，开设公共历史的课程。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但只是开始新课程是不够的。刚才也说了，如果这个公共历史的课程和普通的历史学课程保持分离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日本，大多数初高中老师都是毕业于教育学系。在文学系、法学系和经济学系中也有历史学课程，但基本没有这些院系毕业的。而教育学系的历史学课程，教的都是在教室讲课的相关技巧，并不让学生自主去阅读原始史料和尝试解读。他们会学习需要教学的内容和相关历史解释，但历史学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对史料的批判性思考”，他们没有经历这个部分便毕业去做学校的老师了。

所以，如果公共历史的课程也这么做的话，只是再生产出新的分裂而已，我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在日本也应该开设公共历史的课程。而在开设课程时，则需要考虑到这些要点。特别是从事通常的历史学的专家们，我希望你们可以主动去接近公共历史，以及初高中的老师们和博物馆馆员们，甚至还有那些在博物馆做义务讲解的人员们。学术历史的专家们一直以来都是各自从事自己的工作，今后需要采取行动，进行横向的合作。我希望从事学术研究的各位可以积极主动承担起这个工作。

我讲的太多了，因为今天谈论的主题非常重要，所以我就多讲了一些。感谢各位老师发表的宝贵见解。

这次的会议想必也给各位同传老师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我想跟大家一起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也要感谢渥美财团一直以来的支持。今后也请多多指教。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闭幕致辞

赵珖

高丽大学名誉教授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大家好，接下来将由我发言。

本次召开的第七届“国史对话”的主题是“历史大众化”。“历史大众化”问题很早就成为了“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关注的课题之一，但它并不是公共史学的全部，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大众化”之所以被选为此次网络研讨会主题，是因为中日韩历史学界认为，在传统历史、学术型历史学上，很难再忽视“公共史学”这一历史学“新”的研究动向。在韩成敏老师将历史大众化作为问题提出后，又展开了较为活跃的会议讨论。在今天的会议即将结束之际，我想再次概括一下历史学界通常所提示的公共历史的概念及其展望，以及韩国公共历史学的现状等相关问题。

我想大家都知道，首位使用公共历史，即“Public History”这个用语的是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y），他曾将之定义为“公共历史是在课堂之外实践的历史”。正如这个定义所显示的，我们可以将基于美国传统的公共史学概念，看作是对传统“学术型历史学”独霸的一种抵抗。当然，在 1920 年代，美国使用公共历史这一概念之前，欧洲历史学界和哲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公共和公共性，以及公众、大众等概念。而 1970 年代以来，我认为公共历史学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中得到了更丰富的灵感。

但正如平山升老师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那样，为了理解某个事件或现象，我认为需要从史学家的层面去理解。通过史学史来看待公共历史的话，可以发现它在美国、欧洲各国登场时，有着不同的契机和历史条件。因此，欧美的历史学家在“公共历史”这一概念上，不同的研究者，对概念的把握也各有差异。而且，从今天的报告和讨论可以看出，大家对公共历史在亚洲各国固有的背景和脉络均有所把握，并从各自立场进行了多样的讨论。我认为通过今天的会议，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演讲者和讨论者们都是在反映出各国公共史学存在的特性的基础上推进了各自的研究。

另一方面，在公共史学中，大家在认识到需要关注作为历史生产者的大众的同时，也认识到了需要关注与新媒体发展相关联的历史的沟通与普及的相关现象。韩国的金滹老师对于重视作为历史生产者的个人叙事的现象，认为对个人存在的关注正是公共历史开创出来的最核心的要素。但是每个国家的情况也都各不相同。

今天通过网络研讨会共同表明出来的一点是“通过历史的叙述和再现进行沟

通”是否是公共历史的核心关注点，也指出了通过叙述将历史再现之后与普通大众进行沟通的问题。但是公共历史不同于以形成集体历史意识为主要目标的学校教育，它并没有提出培养这种集体历史意识的明确目标。公共历史概念在欧洲和美国体现的共同特性是，在社会中对历史进行各种形式的活用与践行。

这一点在韩国也如实地体现了出来。在韩国，历史大众化问题和公共历史讨论受到关注的契机是“国史教科书的国定化问题”，这可谓是一件悲剧性的事件。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拥有高人气的非专业历史研究者的登场，也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 (influencer)”的出现，在普及历史的同时他们也歪曲了历史。此外，借助与周边国家的历史纷争，正在持续出现“国粹历史学 (民族主义历史学)”人气高涨的情形。

韩国学界也开始认真对此做出反应。在韩国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相关团体每年都举行历史学大会。该历史学大会 2017 年的主题是“历史消费时代、大众与历史学”，这体现了当今韩国历史学界正在关注公共历史乃至历史与大众的关系。另外，在韩国历史学界发行的具有代表性且广受欢迎的学术杂志之一的《历史批评》最近也推出了相关特辑（《历史批评》“韩国公共历史的现场与实践问题”）。

这种公共历史的发展对作为学问的历史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虽然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但历史学正在持续丧失其权威性，而不同国家似乎也都出现了大学历史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公共历史”可以成为打破这种状况的对策，也可能加速历史学家的危机，总之它是一把双刃剑。历史研究者认为“近代历史学 (Modern History)”将成为当今对后现代历史的一种对抗，它强调的是，存在只有历史研究者才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必须由历史研究者承担的责任。我相信今天的历史学家也该像近代历史学家一样一边搜寻证据一边履行自己的职责。

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公共历史学在亚洲的发展方向。哪怕在今天如此认真筹备的网络研讨会里，问题也无法一下子全部得到解决。关于公共历史学应有的前进方向，刘杰老师在提问过程中已经讲过了。但是在当今的公共历史中，“关于公共的研究”非常重要，我认为相关研究大致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将焦点放在大众本身，研究大众对历史的消费或通过参与进行历史生产的方法；二是聚焦在公共领域，研究制度、历史的大众形态、通过参与过去如何产生历史知识。

从最近的国际研究动向来看，呈现出了前者明显减弱，而向后者集中的样态。但是，公共历史学家在关注公众的历史意识如何形成的同时，决不可忽视大众是使历史知识的生产、消费、协商成为可能或对其产生限制的重要因素。另外，除了部分公共历史提出的后现代层面的关切之外，我认为要继续探索能够活用近代历史学所具有的优势和历史功能的方法。

我是从第 1 届就开始参与国史对话的，从第 1 届就参与进来的年轻研究者中，已有不少人已成为学界的主要研究人员。自菲律宾举行的第 4 届对话以来，连续参与网络研讨会的研究者们渐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这种情况来看，我认为从第 1 届国史对话开始积累的对话经验正在逐渐结出果实，能够对三个国家发挥出影响力。三个国家的研究人员通过 7 次聚会，到达了机械式聚集无法到达的“地点”。

今天的主题再次提醒了研究者们应该履行怎样的义务。虽然，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但希望各位能更加努力地将自己的影响力传达给三个国家。通过今天的报告，各位对公共历史学进行了认真地审视，并共同思考应该前进的方向，我向做出这份

努力的各位参与者表示感谢。我认为，通过今天的网络研讨会，在亚洲公共历史学的概念被总结整理得更加清晰明确了，也为公共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加快步伐的新机会。向今天所有参与者表示由衷的感谢，非常感谢大家。

讲师简介

■ 韩成敏 / HAN Sungmin

1991年东国大学史学科学士。1998年东国大学研究生院史学科硕士。2016年东国大学研究生院史学科博士课程毕业。文学博士。现担任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院研究教授。研究领域为韩国近代史、近代日韩关系史、韩国近代外交史。以近代以后走向明确不同道路的韩国与日本作为问题意识，细致从事作为日韩之间历史问题起源的近代日韩关系史的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日本的“韩国合并”过程研究》（京仁文化社，2021）；《日本对第二次海牙万国和平会议朝鲜特使的应对》（《韩日关系史研究》51，2015）；《日本政府对流亡者金玉均的应对及其朝鲜政策（1884-1890）》（《历史与现实》109，2018）；《1907年体制成立过程中日本的韩国政策与韩国社会的应对》（《日本历史研究》49,2019）等。

代后记

金 因泰

全南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2022年8月6日举行的第七届“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会议的主题是“‘历史大众化’与东亚历史学”。历史大众化和公共历史是可以超越国籍和专业领域进行对话的主题，参与对话的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讨论。

第一部分在李恩民老师的主持下进行问题提出和指定讨论。在彭浩老师的举办主旨讲话结束后，韩成敏老师提出了问题。自菲律宾举行第四届国史对话以来，一直积极参与并提出尖锐意见的韩成敏老师所提出的问题非常切合时宜。韩老师以“共同思考‘历史大众化’”为题目提出了问题。对这一主题，韩老师平时和同行学者们做了很多思考，这次提出问题可以说是对此做出的整理。

他将韩国的事例分为历史学危机、历史学家的危机以及现实问题（历史学专业的存续和毕业生的就业）三个部分进行了介绍。简而言之，历史学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需要做好应对。也就是说，应该承认历史学家垄断历史的时代已经结束，且需要做出改变。

作为应对方案之一，韩老师介绍了公共历史这一概念。虽然这个概念或方式在韩中日三国还没有稳定地确立其理论，但韩老师认为，对其思考越快进行越好。同时还提议说，历史学现在正处在证明自身存在意义的时期。

对此，负责指定讨论的三个国家的研究人员（中国的郑洁西老师、日本的村和明老师、韩国的沈哲基老师）谨慎而积极地提出了意见，并介绍了各国相似而又不同的观点，讲得津津有味。各国学者在历史学界的权威（例如：历史学家不能让步）、历史学家在今后的角色等方面的认识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差异。特别是中国，大众对历史的参与非常积极，并且对此以积极的视角去看待。但是，在新媒体中非专业历史学家寻找大众希望的缝隙的情况和历史学作为职业失去稳定性的情况（就业困难）似乎与韩日情况近似。这或许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也有意见认为，应该承认公共历史学这一对策，并为此准备空间，三个国家也都提出了定义公共历史概念的必要性。

第二部分在南基正老师主持下进行自由讨论。首先刘杰老师进行了论点的整理，并指出了需要警惕历史与政治的联结（成为工具），以及历史学家需要克服的问题和无法完全应对的问题等。

在自由讨论中，有如下讨论。对于源自历史经验的活跃的大众历史面貌，以

及媒体和剧变的世界这一现实的点评（毛立坤老师）；历史的大众化是必然的——从历史上来说，由国家来整理历史是一种历来的原则，但是对此的挑战总是存在的——公共历史学的核心是所有人都想成为历史学家，这反而是机会，承认和包容多样性的态度更重要，同时应该拒绝不可容忍的过度商业化、政治介入、历史修正主义等（金浩老师）；应该转变思想接受大众的历史，将其视为机遇，大众历史也具有效用（盐出浩之老师、佐藤雄基老师）。

除了这些比较乐观的或敦促历史学家积极改变的见解之外，还有其他多种意见。平山升老师强调，要记住这是近代日本历史上存在过的事情。村和明老师虽然认同危机和机会并存，但对于历史专家能否与专家以外的人一起进行讨论却持悲观的看法。正所谓，伪历史学的最大危险性在于其对社会的分化，例如对“制造敌人”这一问题的提出就非常重要。这并不是两种相反的论调，实际上作为历史学家，大家似乎在思考相似的问题，并在思考相似但略有不同的对策。历史大众化是历史学家们共同思考后应该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必须要克服并且战胜的问题。

第三部分由李恩民老师主持，以三谷博老师的总结和赵珖老师的闭幕致辞收尾。两位老师均对“年轻”研究者的苦恼表示理解，并给予了鼓励。

本次“对话”的目标之一可能是放下肩上的包袱，自由地畅谈。但是在对话过程中，听到有着同样苦恼的研究人员的故事，在感到高兴的同时，又感到沉重的负担再次降临。今后历史学家的作用会是什么呢？在此次对话中，我们使用了“大众”一词，但大众也不能视之为一体。在大众里面，有喜欢善恶分明的感人历史故事的群体，也有对特定领域甚至比专门研究者都更感兴趣的人，还有些可能是因为以背诵为主的历史教育而对历史失去兴趣的人，还有人则认为自己此前了解的历史有假，并因此成为了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者”。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虽没有办法满足所有大众，但在这种多样化的大众面前肯定有其作用。

笔者偶尔会参加一些介于大众演讲与学术会议之间的中间性质的活动。有时候会听到类似“没什么意思”、“不够感动”之类的意见，因为人们希望能够听到像历史电视剧一样感人的演讲。对此我起初不能接受，但现在已经不会了，我有时还会根据人们的兴趣准备一两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最近，一种职业似乎都需要扮演多种角色。笔者认为，今后历史研究者除了要写好学术论文这一纯粹的任务以外，至少也应该起到引导大众的作用，防止他们陷入错误的历史理解之中（当然是以大众能够接受的语言和形式）。即便再有趣，但如果其中有错误的内容，就应该及时予以纠正，并对历史爱好者可能会错过的历史洞察进行提示。写大众书、翻译国外优秀书籍、使用多种媒体传达正确的历史等都是具体的方法。笔者认为，不能因为这些事情不是学者的分内之事就无视和畏惧。在现代社会，联系大众就是历史研究者的义务。能做的事和该做的事就都得做，如果只对像化石一样的所谓学术感到满意，那你就只能扮演这一类的角色。

（金 因泰《第七届国史对话“‘历史大众化’与东亚历史学”报告书》转载）

■金 囿泰 KIM Kyongtae

出生于韩国浦项市，韩国史专业。在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攻读博士期间，于 2010 年至 2011 年间，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日本文化研究专业（日本史学）外国研究生的身份留学。2014 年在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曾任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高丽大学人文力量强化事业团研究教授，目前担任全南大学历史教育系助理教授。研究关注战争的破坏性本性与必定从战争所引发的荒原中生长出的和平的历史。

主要著作：《壬辰战争期讲和交涉研究》（博士论文）、《虚势与妥协——围绕壬辰倭乱的三国协商》（东北亚历史财团，2019 年）等。



第七届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历史大众化’与东亚历史学” 参加者名单

	姓名 (罗马字)	姓名 (日语)	姓名 (韩语)	姓名 (中文)	所属单位 (日语)
报告人					
1	Han Sungmin	韓 成敏	한 성민	韩 成敏	高麗大学
指定讨论者					
2	Zheng Jiexi	鄭 潔西	정 제시	郑 洁西	温州大学
3	Sim Chulki	沈 哲基	심 철기	沈 哲基	延世大学
指定讨论者 / 组委会成员					
4	Mura Kazuaki	村 和明	무라 가즈아키	村 和明	東京大学
自由讨论小组成员					
5	Hirayama Noboru	平山 昇	히라야마 노보루	平山 升	神奈川大学
6	Kim Ho	金 滸	김 호	金 滸	ソウル大学
7	Mao Likun	毛 立坤	마오 리쿤	毛 立坤	南開大学
8	Sato Yuki	佐藤雄基	사토 유키	佐藤雄基	立教大学
自由讨论小组成员 / 组委会成员					
9	Shiode Hiroyuki	塩出浩之	시오데 히로유키	盐出浩之	京都大学
10	Song Zhiyong	宋 志勇	송 지용	宋 志勇	南開大学
组委会成员					
11	Chen Lu	陳 璐	첸 루	陈 璐	早稲田大学
12	Cho Kwang	趙 珖	조 광	赵 珖	高麗大学名誉教授
13	Chong Soonil	鄭 淳一	정 순일	郑 淳一	高麗大学
14	Kim Kyongtae	金 キョンテ	김 경태	金 囧泰	全南大学
15	Li Enmin	李 恩民	리 언민	李 恩民	桜美林大学
16	Liu Jie	劉 傑	류 지에	刘 杰	早稲田大学
17	Mitani Hiroshi	三谷 博	미타니 히로시	三谷 博	東京大学名誉教授
18	Nam Kijeong	南 基正	남 기정	南 基正	ソウル大学
19	Peng Hao	彭 浩	펑 하오	彭 浩	大阪公立大学
同声传译					
20	Ding Li	丁 莉	정 리	丁 莉	北京大学
21	Song Gang	宋 剛	송 강	宋 剛	北京外国語大学
22	Lee Hyeri	李 헤리	이 헤리	李 惠利	韓國外国語大学
23	Ahn Younghee	安 ヨンヒ	안 영희	安 暎姬	韓國外国語大学
24	Jin Danshi	金 丹实	김 단실	金 丹实	通訳翻訳者 (フリーランス)
25	Piao Xian	朴 賢	박 현	朴 贤	京都大学
翻译					
26	Hong Yongil	洪 龍日	홍 용일	洪 龙日	東京大学
27	Yu Ning	于 寧	유 닝	于 宁	東京大学
28	Yun Jae-un	尹 在彦	윤 재언	尹 在彦	立教大学
事務局					
29	Imanishi Junko	今西淳子	이마니시 준코	今西淳子	渥美財団
30	Tsunoda Eiichi	角田英一	쓰노다 에이이치	角田英一	渥美財団
31	Nagai Ayumi	長井亜弓	나가이 아유미	长井亚弓	渥美財団
32	Miyake Aya	三宅 綾	미야케 아야	三宅 綾	渥美財団

SGRA 報告 已发行期号介绍

- SGRA レポート01 設立記念講演録 「21世紀の日本とアジア」 船橋洋一 2001. 1.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2 CISV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への挑戦：多様性の中に調和を求めて」
今西淳子、高 偉俊、F. マキト、金 雄熙、李 來賛 2001. 1. 1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技術の創造」 畑村洋太郎 2001. 3. 1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4 第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の皆さんへ」 関 啓子、L. ビッヒラー、高 熙卓 2001. 5.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5 第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なかの新しい東アジア：経済協力をどう考えるべきか」
平川 均、F. マキト、李 鋼哲 2001. 5.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6 投稿 「今日の留学」「はじめの一步」 工藤正司 今西淳子 2001. 8.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7 第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共生時代のエネルギーを考える：ライフスタイルからの工夫」
木村建一、D. パート、高 偉俊 2001. 10.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8 第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T 教育革命：ITは教育をどう変えるか」
白井建彦、西野篤夫、V. コストブ、F. マキト、J. スリスマンティオ、蔣 恵玲、楊 接期、
李 來賛、斎藤信男 2002. 1.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9 第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と民族主義：対話と共生をキーワードに」
ペマ・ギャルポ、林 泉忠 2002. 2. 28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0 第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とイスラーム：文明間の対話のために」
S. ギュレチ、板垣雄三 2002. 6. 1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1 投稿 「中国はなぜWTOに加盟したのか」 金香海 2002. 7. 8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2 第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環境診断：地球の砂漠化を考える」
建石隆太郎、B. プレンサイン 2002. 10. 2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3 投稿 「経済特区：フィリピンの視点から」 F. マキト 2002. 12. 12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4 第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中の新しい東アジア」+宮澤喜一元総理大臣をお迎えして
フリーディスカッション
平川 均、李 鎮奎、ガト・アルヤ・プートゥラ、孟 健軍、B. ヴィリエガス 日本語版2003. 1. 31発行、
韓国語版2003. 3. 31 発行、中国語版2003. 5. 30発行、英語版2003. 3. 6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5 投稿 「中国における行政訴訟—請求と処理状況に対する考察—」 呉東鎬 2003. 1. 31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6 第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情報化と教育」 苑 復傑、遊間和子 2003. 5.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7 第1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21世紀の世界安全保障と東アジア」
白石 隆、南 基正、李 恩民、村田晃嗣 日本語版2003. 3. 30発行、英語版2003. 6. 6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8 第1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研究：国境を越える取り組み」 高橋 甫、貫戸朋子 2003. 8.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9 投稿 「海軍の誕生と近代日本—幕末期海軍建設の再検討と『海軍革命』の仮説」 朴 栄濬
2003. 12. 4発行

-
- SGRA レポート20 第1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環境問題と国際協力：COP3の目標は実現可能か」
外岡豊、李海峰、鄭成春、高偉俊 2004. 3.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1 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 「アジア共同体構築に向けての日本及び韓国の役割について」2004. 6.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2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民族紛争—どうして起こるのか どう解決するか」 明石康 2004. 4.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3 第1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
宮島喬、イコ・プラムティオノ 2004. 2. 2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4 投稿 「1945年の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の中国に対する援助：その評価の歴史」 フスレ 2004. 10. 2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5 第1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国境を越えるE-Learning」
斎藤信男、福田収一、渡辺吉裕、F. マキト、金 雄熙 2005. 3. 31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6 第1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この夏、東京の電気は大丈夫？」 中上英俊、高 偉俊 2005. 1. 24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7 第1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過去・現在・未来」
竹田いさみ、R. エルドリッジ、朴 榮濬、渡辺 剛、伊藤裕子 2005. 7.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8 第1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 地球市民の義務教育-」
宮島 喬、ヤマグチ・アナ・エリーザ、朴 校熙、小林宏美 2005. 7.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9 第18回フォーラム・第4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韓流・日流：東アジア地域協力におけるソフトパワー」 李 鎮奎、林 夏生、金 智龍、道上尚史、木宮正史、李 元徳、金 雄熙 2005. 5.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0 第1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文化再考—自由と市民社会をキーワードに—」
宮崎法子、東島 誠 2005. 12.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1 第2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雁はまだ飛んでいるか」
平川 均、渡辺利夫、トラン・ヴァン・トウ、範 建亭、白 寅秀、エンクバヤル・シャグダル、F. マキト
2006. 2.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2 第2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人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留学生—」
横田雅弘、白石勝己、鄭仁豪、カンピラパーブ・スネート、王雪萍、黒田一雄、大塚晶、徐向東、
角田英一 2006. 4.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3 第2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戦後和解プロセスの研究」 小菅信子、李 恩民 2006. 7.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4 第2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人と宗教：宗教って何なの？」
島蘭 進、ノルマン・ヘイヴンズ、ランジャンナ・ムコパディヤーヤ、ミラ・ゾンターク、
セリム・ユジェル・ギュレチ 2006. 11.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5 第2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ごみ処理と国境を越える資源循環～私が分別したごみはどこへ行くの？～」
鈴木進一、間宮 尚、李 海峰、中西 徹、外岡 豊 2007. 3.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6 第2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Tは教育を強化できるか」
高橋富士信、藤谷哲、楊接期、江蘇蘇 2007. 4.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7 第1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in 北京講演録 「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若者の未来と日本語』」
池崎美代子、武田春仁、張 潤北、徐 向東、孫 建軍、朴 貞姫 2007. 6.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8 第6 回日韓フォーラム in 葉山講演録 「親日・反日・克日：多様化する韓国の対日観」
金 範洙、趙 寛子、玄 大松、小針 進、南 基正 2007. 8.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9 第26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思想史～私たちの出会いと将来～」
黒住 真、韓 東育、趙 寛子、林 少陽、孫 軍悦 2007. 1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0 第27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アジアにおける外来種問題～ひとの生活との関わりを考える～」
多紀保彦、加納光樹、プラチャー・ムシカシントン、今西淳子 2008. 5.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1 第28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いのちの尊厳と宗教の役割」
島藺進、秋葉悦子、井上ウイマラ、大谷いづみ、ランジャンナ・ムコパディヤーヤ 2008. 3.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2 第2 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新疆講演録 「黄土高原緑化協力の15 年—無理解と失敗から
相互理解と信頼へ—」 高見邦雄 日本語版、中国語版 2008. 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鹿島守之助とパン・アジア主義」 平川均 2008. 3.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4 第29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広告と社会の複雑な関係」 関沢 英彦、徐 向東、オリガ・ホメンコ
2008. 6.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5 第30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教育における『負け組』をどう考えるか～
日本、中国、シンガポール～」 佐藤香、山口真美、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 2008. 9.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6 第31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水田から油田へ：日本のエネルギー供給、食糧安全と地域の活性化」
東城清秀、田村啓二、外岡 豊 2009. 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7 第32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オリンピックと東アジアの平和繁栄」
清水 諭、池田慎太郎、朴 榮濬、劉傑、南 基正 2008. 8. 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8 第3 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延辺&北京講演録 「一燈やがて万燈となる如く—
アジアの留学生と生活を共にした協会の50 年」 工藤正司 日本語版、中国語版 2009. 4.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9 第33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が格差を縮めるか」
東 茂樹、平川 均、ド・マン・ホーン、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 2009. 6.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0 第8 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韓の東アジア地域構想と中国観」
平川 均、孫 洌、川島 真、金 湘培、李 鋼哲 日本語版、韓国語 Web 版 2009. 9.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1 第35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テレビゲームが子どもの成長に与える影響を考える」
大多和直樹、佐々木 敏、渋谷明子、ユ・ティ・ルイン、江 蘇蘇 2009. 1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2 第36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市民社会と21 世紀の課題」
宮島 喬、都築 勉、高 熙卓、中西 徹、林 泉忠、ブ・ティ・ミン・チィ、
劉 傑、孫 軍悦 2010. 3.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3 第4 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上海講演録 「世界的課題に向けていま若者ができること～
TABLE FOR TWO ～」 近藤正晃ジェームス 2010. 4.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4 第37 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エリート教育は国に『希望』をもたらすか：
東アジアのエリート高校教育の現状と課題」 玄田有史 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
金 範洙 張 健 2010.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5 第3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都市・建築のエネギー事情とライフスタイル～」木村建一、高 偉俊、Mochamad Donny Koerniawan、Max Maquito、Pham Van Quan、葉 文昌、Supreedee Rittironk、郭 榮珠、王 劍宏、福田展淳 2010. 12.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6 第5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フフホト講演録 「中国の環境問題と日中民間協力」第一部（北京）：「北京の水問題を中心に」高見邦雄、汪 敏、張 昌玉 第二部（フフホト）：「地下資源開発を中心に」高見邦雄、オンドロナ、ブレンサイン 201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7 第3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ポスト社会主義時代における宗教の復興」井上まどか、ティムール・ダダバエフ、ゾンターク・ミラ、エリック・シッケタンツ、島 蘭 進、陳 継東 2011. 12.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8 投稿 「鹿島守之助とパン・アジア論への一試論」平川 均 2011. 2.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9 第10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1300年前の東アジア地域交流」朴 亨國、金 尚泰、胡 潔、李 成制、陸 載和、清水重敦、林 慶澤 2012. 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0 第4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の少子高齢化問題と福祉」田多英範、李 蓮花、羅 仁淑、平川 均、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F・マキト 2011. 1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1 第41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共同体の現状と展望」恒川恵市、黒柳米司、朴 榮濬、劉 傑、林 泉忠、ブレンサイン、李 成日、南 基正、平川 均 2012.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2 第6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フフホト講演録 「Sound Economy ～私がミナマタから学んだこと～」 柳田耕一 「内モンゴル草原の生態系：鉱山採掘がもたらしている生態系破壊と環境汚染問題」郭 偉 2012. 6.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4 第43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蓼科 講演録「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課題と展望」朴 榮濬、渡辺 剛、伊藤裕子、南 基正、林 泉忠、竹田いさみ 2012.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5 第44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蓼科 講演録「21世紀型学力を育むフューチャースクールの戦略と課題」赤堀侃司、影戸誠、曹圭福、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石澤紀雄 2013. 2.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6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日英戦後和解（1994-1998年）」（日本語・英語・中国語）沼田貞昭 2013. 10.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7 第12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太平洋時代における東アジア新秩序の模索」平川 均、加茂具樹、金 雄熙、木宮正史、李 元徳、金 敬黙 2014. 2.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8 第7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講演録「ボランティア・志願者論」（日本語・中国語・英語）宮崎幸雄 2014. 5.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9 第45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紛争の海から平和の海へー東アジア海洋秩序の現状と展望ー」村瀬信也、南 基正、李 成日、林 泉忠、福原裕二、朴 榮濬 2014. 10.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0 第46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インクルーシブ教育：子どもの多様なニーズにどう応えるか」荒川 智、上原芳枝、ヴィラーク ヴィクトル、中村ノーマン、崔 佳英 2015.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1 第47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科学技術とリスク社会ー福島第一原発事故から考える科学技術と倫理ー」崔 勝媛、島 蘭 進、平川秀幸 2015. 5.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2 第8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近代日本美術史と近代中国」
佐藤道信、木田拓也 2015. 10.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3 第14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第48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経済のダイナミズム
—物流を中心に」李 鎮奎、金 雄熙、榊原英資、安 秉民、ドマン ホーン、李 鋼哲 2015.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4 第49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円卓会議「日本研究の新しいパラダイムを求めて」
劉 傑、平野健一郎、南 基正 他15名 2016. 6.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5 第50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北九州講演録「青空、水、くらし—環境と女性と未来に向けて」
神崎智子、斉藤淳子、李 允淑、小林直子、田村慶子 2016. 6. 27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6 第9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フフホト&北京講演録「日中200年—文化史からの再検討」
劉 建輝 2020. 6. 18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7 第15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これからの日韓の国際開発協力—共進化アーキテクチャ
の模索」孫赫相、深川由紀子、平川均、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 2016. 11.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8 第51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今、再び平和について—平和のための東アジア知識人連帯を考
える—」南基正、木宮正史、朴栄濬、宋均宮、林泉忠、都築勉 2017. 3. 27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9 第52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
劉傑、趙珖、葛兆光、三谷博、八百啓介、橋本雄、松田麻美子、徐静波、鄭淳一、金キョンテ
2017. 6. 9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0 第16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中韓の国際開発協力—新たなアジア型モデルの模索
—」
金雄熙、李恩民、孫赫相、李鋼哲 2017. 5. 16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1 第56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人を幸せにするロボット—人とロボットの共生社会をめざして
第2回—」稲葉雅幸、李周浩、文景楠、瀬戸文美 2017. 11.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2 第57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2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蒙
古襲来と13世紀モンゴル帝国のグローバル化」葛兆光、四日市康博、チョグト、橋本雄、エルデニ
バートル、向正樹、孫衛国、金甫枕、李命美、ツェレンドルジ、趙阮、張佳 2018. 5.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3 第58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を結ぶ? 『一带一路』の地政学」朱建栄、李彦銘、朴栄
濬、古賀慶、朴准儀 2018. 11. 16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4 第11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からみた中国美術史学」塚本磨充、呉孟晋
2019. 5. 17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5 第17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北朝鮮開発協力：各アクターから現状と今後を聞く」
孫赫相、朱建栄、文景鍊 2019. 11. 22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6 第59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3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
17世紀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戦乱から安定へ—」三谷博、劉傑、趙珖、崔永昌、鄭潔西、荒木和
憲、許泰玖、鈴木開、祁美琴、牧原成征、崔姪姫、趙軼峰 2019. 9.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7 第61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本の高等教育のグローバル化!？」
沈雨香、吉田文、シン・ジョンチョル、関沢和泉、ムラット・チャクル、金範洙 2019. 3. 2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8 第12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中映画交流の可能性」
刈間文俊、王衆一 2020. 9.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89 第62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が世界を変える時…? —不都合な真実を超えて」
ルウェリン・ヒューズ、ハンス＝ヨゼフ・フェル、朴准儀、高偉俊、葉文昌、佐藤健太、近藤恵
2019. 11.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0 第63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4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東アジア』の誕生—19世紀における国際秩序の転換—」三谷博、大久保健晴、韓承勳、孫青、大川真、南基玄、郭衛東、塩出浩之、韓成敏、秦方 2020.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1 第13回SGRA-Vカフェ講演録「ポスト・コロナ時代の東アジア」林 泉忠 2020.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2 第13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国際日本学としてのアニメ研究」大塚英志、秦 剛、古市雅子、陳 龔 2021.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3 第14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西思想の接触圏としての日本近代美術史再考」稲賀繁美、劉 曉峰、塚本啓充、王 中忱、林 少陽 2021.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4 第65回SGRA-V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5回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9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感染症の流行と社会的対応」朴 漢珉、市川智生、余 新忠 2021. 10. 0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5 第19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岐路に立つ日韓関係：これか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か」
小此木 政夫、李 元徳、沈 揆先、伊集院 敦、金 志英、小針 進、朴 栄濬、西野 純也
2021. 11. 1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6 第66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6回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
人の移動と境界・権力・民族」塩出浩之、趙 阮、張 佳、榎本 渉、韓 成敏、秦 方、大久保健晴
2022. 6. 9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7 第67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誰一人取り残さない』如何にパンデミックを乗り越えSDGs実現
に向かうか—世界各地からの現状報告—」佐渡友 哲、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杜 世鑫、
ダルウィッシュ ホサム、李 鋼哲、モハメド・オマル・アブディン 2022 .2.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8 第15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はいかに作られ、モダンはいかなる変化を生んだのか? —空間アジアの形成と生活世界の近代・現代—」山室信一 2022. 6. 9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9 第68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夢・希望・嘘—メディアとジェンダー・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関係
性を探る—」ハンブルトン・アレクサンドラ、バラニャク平田ズザンナ、于寧、洪ユン伸 2022. 11.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00 第20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進撃のKカルチャー——新韓流現象とその影響力」
小針 進、韓 準、チュ・スワン・ザオ 2022. 11. 16 発行

■ レポートご希望の方は、SGRA 事務局 (Tel : 03-3943-7612 Email : sgra@aisf.or.jp) へご連絡ください。

SGRA 报告 No. 0101 (中文版)

第69届 SGRA论坛

第七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历史大众化”与东亚历史学

编辑·发行 公益财团法人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 (SGRA)
邮编 112-0014 东京都文京区关口 3-5-8
电话 : 03-3943-7612 传真 : 03-3943-1512
SGRA 网页 : <http://www.aisf.or.jp/sgra/>
电子邮件 : sgra@aisf.or.jp

发行日 2023年8月2日
发行人 今西淳子
中文版监修 于宁
印刷 (株) 平河工业社

© 关口全球研究会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关于本刊的文章内容, 如有疑问或欲引用请与我们联系。

©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opying is Prohibited. For inquiries or quotes, please contact us.

